

中南海非机

当年，北京的先民们沿着黄土高坡向东迁移，越过峰峦起伏的太行山，蓦然发现了宽阔平坦的华北平原，于是便在其北端聚居生息起来。这里西北、两面为连绵的崇山峻岭，东临渤海，南面则是可供农耕的开阔富庶的平原，具有温带的大陆性季风气候，由永定河、潮白河等构成发达的河海水系。山川环卫，地势雄伟，水甘土厚，物产丰富，的确是栖息生存的好地方。

传说在黄帝时代，黄帝部落就在涿鹿建立了都邑，黄帝的第三代继承者颛顼曾到“幽陵”祭祀。“幽陵”即幽州，是北京城的最早名称。2200多年前，即为战国时代燕国的国都蓟城。从公元前226年秦始皇灭燕，到唐末的1100多年间，蓟城虽降为幽州，但一直是北方中国区域性的政治和商业中心，并逐步发展为军事和交通的重镇。

938年，辽太宗将幽州升为南京，作为四个陪都之一，奠定了成为国都的基础。金贞元元年（1153），北京被正式定为国都，成为与南宋对峙的北部中国的政治中心。

时光荏苒，光阴飞逝百年，统一中国的元朝统

治者于1272年2月，终于将北京定为京都，从此北京跨入了它漫长历史中最辉煌的序章，由此开始，北京连续640余年成为元、明、清三代的都城，成为举世闻名的伟大城市。

三代都城的大规模营建规制，形成了大致保存至今的城市面貌、营造格局、建筑风格，而其建筑风格最为显著的特征是有一条著名的中轴线。

这条中轴线，南起永定门中心点，向北经过正阳门、天安门、午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宫、坤宁宫、神武门、景山最高点万春亭、寿皇殿鼓楼，直抵钟楼中心点，全长近8公里。这条中轴线连接着外城、内城、皇城和紫禁城。城中其他建筑都以这条中轴线为中心，形成东西对称的格局。

1368年，明军攻占大都后，改大都为北平。

一、紧急疏浚中南海

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传到西柏坡，此时西柏坡正是夜深人静之时。

密契闻录

□树军

周恩来看完电文，当即叫来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统战部行政处处长周子建、统战部交际处第一处长申泊纯、统战部交际处第二处长金城。周恩来叫他们连夜出发去北平，为党中央迁入北平打前站。

仍然是战争年代的办事方式。这4位年轻人带着周建人、吴晗等民主人士乘坐的3辆半新的卡车在漆黑的3点钟驶进了酣睡的华北平原。在搓板式的乡间土路上，汽车卷起的冲天烟尘像一条源源不断的墨龙，几个人都成了“土人”，“一路风尘”地赶到北平西郊的燕京大学，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

已经就任北平市市长两个月零三天的叶剑英听说中央派来打前站的人到了，赶紧从他住的德国饭店打来电话：“你们来得太巧了，今天上午举行入城式，就由你们4人代表中央吧。”叶剑英夹着南方味儿的普通话分外清晰。

前门高大的箭楼上只有百十人，林彪、罗荣桓、叶剑英、聂荣臻等四野和华野的领导一声不响，只是庄严的面孔上带着微笑，4位年轻人也被

感染了。

在入城式进行时，一个人匆匆跑上楼来，递给叶剑英一份电报，叶剑英看了一下，塞给了齐燕铭。

电报是周恩来发来的。齐燕铭他们刚从西柏坡出发不久，周恩来就想起忘了强调一件很重要的事，必须让这几个替党中央打前站的同志先把中南海和北京饭店接收下来，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迁入北平做好准备，筹备新政协事宜。中南海将作为政协会场，北京饭店为政协代表下榻之地。当初跟他们交待只是笼统地让他们先期进城筹备新政协，并且为党中央迁往北平做好物质上的准备，并没有讲具体接收的地点。

齐燕铭看完周恩来发来的电报后，赶忙向也在前门箭楼上检阅入城式的北平市警备司令程子华打听中南海的情况。

程子华说：“关于中南海的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我们主要是负责市内的名胜古迹、仓库物资、公共建筑一类的，至于中南海，大概是张明河的纠察总队去接收的。”

按说，中南海作为历代帝王的御苑，实属名胜古迹之列，应该由执行北平警备任务的程子华部队负责。但是，中南海的性质在北平解放前夕发生了变化。

程子华作为东北先遣团的司令员率领美式装备的10万大军入关后，很快打到了北平西郊。身为剿总总司令的傅作义原本怕部队被花花北平腐蚀掉，但他见解放军逼近北京城下，便改变了坚决不进北平市区的初衷，而匆匆地将指挥部连夜搬进了中南海。

傅作义进驻中南海，设华北剿总司令部于居仁堂，这就使中南海由名胜古迹变成了重要的军事机关，这自然也就不是程子华的事了。进北平的卫戍部队，除程子华手下的四十一军和中央警备团改成了公安大队外，就是北平市纠察总队了。

毛泽东高瞻远瞩，为了防止进北平发生李自成那样的失败，不仅要求全党去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而且严令进城部队，除了卫戍部队外，所有的城外部队，一律就地驻守，不许进城。

这样，程子华的部队接管了北海和故宫等地，却没有接到接管中南海的指令。

张明河进城后，把纠察队部驻扎在府右街南口。齐燕铭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便来到了纠察队总部。

张明河见齐燕铭来到纠察队总部，心中猜测，齐燕铭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他今天来肯定是因为什么事，很可能是为中南海而来。

齐燕铭和张明河打完招呼后，开门见山：“老张，今天来，要你办一件大事。这事非常重要。”说完齐燕铭神秘地笑了一下。

“什么大事？”张明河过去是搞地下工作的，与齐燕铭非常熟，所以和齐燕铭说话也不讲究。

“请我吃一顿烤鸭子。”

“嘻，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你老兄搞得这般郑重，其实就是为了吃一顿烤鸭子，不到10块钱的事，这容易得很，小事一桩。”张明河边说边笑。

齐燕铭看了张明河一眼说：“小事？你在中南海驻了多少部队？”

张明河立刻收起笑容，怔了一下，见齐燕铭很严肃很认真地在他问，便赶忙回答：“刚开始派去一个班，现在有一个连在那里住。”

“那你为什么不住在里面？”

“我？官太小了。那么大的中南海，仅房子就有2000多间，如果部队住进去搞了什么破坏，我这乌纱帽还要不要？”

“你很有眼光嘛，对得起党多年来的培养。不过，我告诉你，我来就是接收中南海的，你的部队归我管，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办。”

张明河听后，瞪了一下眼：“你接中南海可以，

但部队归你管，这……”

的确，作为统战部秘书长的齐燕铭，管些纸砚笔墨以及一些杂事，那是正事，对于军队，无论如何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

张明河和齐燕铭很熟，又友谊深厚，便毫不顾忌地问道：“你也想指挥军队了，想掌握军权了？”齐燕铭不理会张明河话语，又重复了一遍说：“不管怎么说，部队归我调动！”

张明河见齐燕铭一再坚持，且又不明白到底为什么，但还是不甘心地又问一次：“你到底想干什么？”

齐燕铭平平淡淡地说：“将来李德胜要来住。”

“哎！那了得！”张明河叫了起来。

张明河非常明白齐燕铭所说的“李德胜”，这是毛泽东转战陕北时给自己起的化名。

毛泽东要住进中南海，可是中南海从清朝到现在就没有清理过，里面乱七八糟。

张明河非常熟悉中南海。他在北平第六中学读书时，经常进出中南海。后来他搞地下党的工作，被国民党从飞行集会上抓住，曾关在中南海。

张明河也非常熟知中南海那不平常的历史，这里曾是民国大总统的总统府，是北平行辕和华北剿总司令部所在地。

但现在，党中央要安排毛泽东住中南海，这怎么能行呢？

想到这儿，张明河对齐燕铭说：“毛泽东住中南海不行！”

“怎么不行？”齐燕铭问。

“中南海不清理不行，全是垃圾。再说，水里有没有炸弹什么的也不知道。”张明河显得有些着急地说。

一阵沉默之后，张明河说：“这样吧，你和我到中南海看一看。”

齐燕铭点了点头，便和张明河一起来到了中南海。

齐燕铭来到中南海，放眼望去，展现在面前的是一幅萧条破败的图景：太液池中尚未开化的冰块呈现一片黑紫色，枯叶和废纸铺天盖地，似乎这里已是几十年没有人烟了。绝胜烟柳的皇家宫苑居然成了这么一副模样！

齐燕铭转遍了整个中南海，没有看到一块干净之地，他与张明河对视了一下，说道：“看来，只有向彭真报告，请他出面了。”

齐燕铭很快找到了彭真，向他汇报了中南海的情况。

彭真对张明河说，找部队把中南海和北海挖一挖。因为齐燕铭对张明河没有隶属关系，要调动张明河的部队，必须经过北京市。

毛泽东要来中南海住，不彻底把中南海挖一

挖不行。北京那时流行大脑炎。这种病是通过蚊子传播的，不彻底打扫一下中南海的水域，怎么敢让毛泽东来住呢！

中南海的清扫工作由周子建负责。张明河的那个部队，集中全部力量挖中南海和北海。华北军区专门派来了一支卡车队，夜以继日地往城外拉太液池里的淤泥。至少有上百年没有动过这些淤泥了，中南海被一团腥臭的空气笼罩着，污水成了不透明的灰黑状。

先放干了污水，小伙子们抬来鱼网，捕捞水中鲜活的各种食用鱼，住在中南海的官兵们天天吃白水煮鱼。

中南海紫黑的底被大自然稍稍风干后，华北军区派了几百名壮实的士兵与张明河部队的士兵一起开挖淤泥。边上挖两米，中间挖一米深，里面子弹、手榴弹也不少，甚至还有枪，足足挖了3个月。

当最后一车垃圾运出中南海时，天快黑了，淡红色的晚霞倒映在中南海的碧波之中，像一条又一条粉红的小鱼。周子建如释重负，将中南海疏浚完工的情况报告给齐燕铭。

齐燕铭则笑着伸出了手，整整3个月的辛劳，还得感谢你的部队士兵和所有为清理中南海而奋战过的士兵和人们。

是啊，中南海变了模样，当夏风驻足中南海时，那满池的碧波真正有了太液的味道了。

二、周恩来身心操劳中南海

1949年3月24日上午12时，以农村包围城市为战略思想的毛泽东，从西柏坡启程，奔赴北平城，毛泽东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

西柏坡村边的大路旁，一长溜儿停放着十几辆美国造的旧式军用吉普车。司机和警卫人员早已整装待命，站在汽车旁边。刚刚开完二中全会的中共高层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张闻天、李立三、杨尚昆、陆定一、王稼祥等人，在工作人员的簇拥下，向汽车队走来。然后，十几位中共首长各乘一辆吉普车，告别了西柏坡，浩浩荡荡地向北平方向驶去。

毛泽东风趣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就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行啊？”

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汽车离开西柏坡，沿着山间公路向东北方向

驶去。这个车队共有11辆小汽车和10辆卡车。卡车里坐的是警卫战士和少数机关工作人员，还有行李。是夜，在唐县住了一宿。再往前就是河北省委所在地保定，他们听取了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的汇报，当天傍晚抵达涿县。天黑后，叶剑英从北平赶来，商定第二天的日程。

周恩来向他交待：到北平住下以后，要在西苑机场举行入城式。先检阅部队，然后与各界代表见面，特别是与那些知名党外人士见面。这些人过去和我们合作共事，今天胜利了，他们很高兴，急于想见到我们。

3月25日，毛泽东秘密进入北平。他没有在前门火车站下车，也没有住进中南海。他从清华园火车站下车，在颐和园小憩之后，来到西郊机场，由叶剑英陪同检阅了部队。

是夜，毛泽东夜宿颐和园，尔后，搬住到香山脚下的双清别墅。

周恩来副主席担负着筹备建国工作，便和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带着统战部的同志，率先进驻中南海。

为了新政协筹备会如期举行，为了起草共同纲领，周恩来一连几天把自己关在中南海勤政殿，通宵达旦地工作起来。与此同时，他还亲自布置中南海的修建事宜。

一天，中央机关行政处修建科的同志来到中南海。周恩来知道后，马上召集田畴局长和修建科的同志们研究中南海的修建工作。

从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人的办公室、住宅到中央各部的办公地方，到中央领导人会客开会的地方、就餐的地方，周恩来都一一提出了修建意见和方案。

在研究中南海修建的时候，有人提出，中南海是过去帝王的御苑，其任何建筑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一般的修建工人对其古建特色不是很熟悉，能否请一些古建学家来，在其修建时给予指导。

周恩来听后，表示同意，并将此事交给了田畴局长办理。

最后，周恩来郑重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中央机关要搬到中南海，中南海将要成为党中央办公的地方。因此要抓紧修建，要争取在两个半月内完成房屋的修建工作，为党中央、毛主席提供一个安静舒适的工作环境。在修建工作上，我刚才提供的意见可作为参考，在具体修建中，有些问题你们可以灵活处置，我提的不妥的地方，你们还可以修改。

因周恩来公务繁忙，他说完，便忙其他事务去了。修建科的同志们根据周恩来提出的修建意见，又一次进行了研究布置，但毕竟对中南海的具体情况不太熟悉，为此决定，修建科的同志，到中

南海所有需要修建之处，进行现场勘查。

修建科的同志们从瀛台到怀仁堂，从紫光阁到颐年堂，一地一处地深入细致地勘查，当他们将勘查的结果汇总之后，发现周恩来提出的规划布局合理，非常便于领导同志们的工作和生活。当时，他们感到纳闷，后来才知道，自周恩来率先进驻中南海之后，他早已在工作之余，对中南海的各个建筑、中南海的整体布局，直至每个角落都进行了考察。为此，周恩来在布置修建中南海工作任务时，早已成竹在胸，点面俱到。周恩来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不由得使人们产生深深的敬意。

修建科的同志们在经过几天的现场勘察之后，制定出了具体的施工方案，方案上报周恩来，周恩来在他的名字上画了个圈，并写上了“同意”两字。

施工方案批示下来后，修建科聘请了工人，购买了建筑材料，接着，在专家们的指导下，紧张的抢修工作开始了。

一天上午，修建科的同志们正在修建颐年堂。颐年堂是丰泽园的主体建筑，院内东西厢房上悬匾“云山画”、“烟雨图”，这是慈禧太后的字。颐年堂在清初时称为崇雅殿，后为澄怀堂，是康熙初年儒臣给皇帝讲学之处，后澄怀堂改名颐年殿，到民国初年改名为颐年堂。

世事沧桑，当年富丽堂皇的颐年殿，因年久失修，如今已是破败不堪了。

也正是在修建颐年堂时，周恩来来到了施工现场，他微笑着向每个人打招呼，并问候同志们辛苦了。

修建科的王保成同志见周恩来副主席来到工地，便急忙迎上去，向周恩来汇报施工进展情况，并将修缮颐年堂的具体计划给周恩来看。周恩来高兴地边看边说，你们的计划很好，想得也很周到。中央机关搬来后，不但要有地方办公、开会，而且还要有接待客人和吃饭的地方，因此，要先修好颐年堂、春耦斋会议室和小灶、饭厅。

王保成说：“我们保证在一个月内完成颐年堂和春耦斋及小灶的修建任务。”

周恩来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后，他又走进颐年堂。看了看室内的装修，摸了摸装修好的墙面说：“中南海潮湿，修整房屋关键要处理好防潮问题。”

修建科的同志便向周恩来汇报说：“我们采用‘三毡两油一水泥’的防潮法，从试验后的效果来看很好，又很经济。”

站在周恩来身旁的一位工人补充说：“三毡两油一水泥，就是三层油毡、两层沥青、一层水泥。”

周恩来听后，再次满意地点了点。并说道：“无论干什么工作，就应该这样，既要讲效果，又要厉

行节约，这要形成风气，你们这样做很好。在修建过程中，遇到不好解决的问题，可以直接找我。如果人手不够，可以从香山再调一些……”

在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中南海地面房屋的修建工作进展很快，到了6月底，各部的办公室基本修完，部分中央首长和机关的同志陆续从香山或其他地方迁到了中南海。

这时，修建科的同志们又接受了修建居仁堂和菊香书屋的任务。

菊香书屋在颐年堂东侧，是丰泽园的附属建筑，清时名菊香书屋，系藏书之所。

菊香书屋将作为毛主席的住所，为此，修建科的同志们感到能为毛主席做事而心里特别高兴。

通往菊香书屋的小路和院落，由于多年失修，路面上的方砖有的磨成了深坑，走起路来一高一低，很容易打趔趄扭伤脚腕。为此，许多同志建议干脆拆掉修成水泥路。

周恩来闻知此事后，特意来到菊香书屋，检查修建科的施工情况。

在检查时，他说：“中南海的建筑反映着我国近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这里的一砖一石，一雕一刻都是劳动人民智慧和艺术的结晶，我们要保留中南海的固有特色，让劳动人民享受到自己的艺术成果。”

周恩来说到这儿，转过头来对王保成说：“小王呀，你一直在主席身边工作，非常了解主席的工作和生活习惯，要按主席的习惯安排住房。主席喜欢读书书房就设计得大一些；主席要经常接见客人，客厅要布置得美观大方。主席是十分珍惜古文化和古建筑的，整修书房既要保留原有风貌，又要适合主席的生活习惯，尽量做到两全其美！”

修建科的同志们无不为周恩来副主席那种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所感动。从此，修建科的同志们更加爱护珍惜中南海的一草一木，在修建中特别注意保护古物。

在当时，由于没有方砖和琉璃瓦，修建科的同志们就到砖厂联系仿制。解决了急需，使一切装饰都保持了原有特色。

园林队的工人们，发现有的古槐古柏的树干流“脓”腐烂，就及时用水泥将伤疤封住，还用石头和泥土把树根都圈起来，加以保护，使这些古树焕发了“青春”。

三、毛泽东对双清别墅情有独钟

毛泽东等进京后的第一个休息的地方是颐和园。

颐和园，坐落在北京西北郊，包括万寿山、昆

明湖，方圆 16 里，占地 4350 亩，其中昆明湖水域占 3/4，以万寿山为主的陆地占 1/4，规模宏伟，景色秀丽，是闻名于世的大型园林。

辽代以前，万寿山只不过是高粱河畔的一座小山。金海陵王迁都燕京后，最早盖起了金山行宫。金章宗完颜璟又把玉泉诸水引至金山脚下，取名金水池，这就是昆明湖的前身。

1262 年和 1290 年，元世祖忽必烈兴漕运，先后两次命都水监郭守敬引玉泉诸水至瓮山脚下，并将金水池疏浚扩展为北京西郊大水库，先后易名为瓮山泊和大泊湖，俗称西湖和西海子。又将所挖西湖之土运上瓮山，使瓮山更高，西湖更大，才成为真正山高水阔的风景胜地。

1494 年，明孝宗为给他乳母助圣夫人祈福，在瓮山上建起了圆静寺。1506—1521 年，明朝最爱游山玩水的正德皇帝，在大泊湖建起了好山园行宫，将瓮山改名金山，大泊湖改名金海，总称好山园，俗名西湖景。

1750 年，乾隆皇帝为庆贺他的生母孝圣皇太后钮钴禄氏 60 寿辰，大兴土木。拆毁明朝圆静寺，改建大报恩延寿寺，将瓮山命名为万寿山，大泊湖改名为昆明湖。万寿山、昆明湖总称清漪园，历时 15 年完成。

1860 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三山五园同遭火焚，清漪园除个别建筑外均成灰烬。但在以后，慈禧揽权，她不顾民族危亡，于同治年间几度指使亲信上书奏请修复圆明诸园。光绪即位后，慈禧便暗中挪用海军经费大规模地修建清漪园，改名为颐和园。

1901 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回北京。颐和园成了慈禧推行媚外政策的中心。每逢佳节，园中盛宴外国使臣，慈禧亲自陪同他们游湖赏花，举杯言欢。

1911 年，辛亥革命迫使清末帝溥仪退位。根据皇室优待条件，颐和园为溥仪的私产。1914 年颐和园首次开放，1924 年正式辟为公园。

如今，以农村包围城市为战略思想，最终实现夙愿的毛泽东，来到了北平，并且首站是暂住颐和园，这着实令柳林溪激动不已。

1949 年 3 月 25 日早上，北平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来电话，要颐和园管理处主任柳林溪马上到他办公室，说有要事相告。

柳林溪放下电话，急忙赶到市政府薛子正办公室。柳林溪见到薛子正，刚要开口问有什么事相告时，薛子正开了口：“介绍信已开好，你拿着信乘我的车，火速赶到社会部找李克农部长报到。具体任务，李部长会向你交待。”

柳林溪有点摸不清头脑，但看到薛子正的语气急迫，面部表情严肃，便没有多问，走出薛子正

办公室，赶往社会部。

在社会部，李克农接过柳林溪递过来的介绍信，看完后，又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柳林溪，而后便非常严肃地说：“今晚 10 点钟左右，党中央、毛主席从西柏坡来北平，要在颐和园景福阁休息。你在东大门等候，负责接待安排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休息。”

“保证完成任务！”按捺不住激动心情的柳林溪似乎觉得刚才这句话不是很圆满，便又补充了一句：“保证高质量高标准地完成接待任务！”

晚上 10 点多钟，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来到了颐和园。

第一辆车坐的是毛泽东，柳林溪忙上前迎接。

毛泽东下车后，关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你是颐和园的负责人？”

柳林溪激动地说：“我叫柳林溪，是颐和园管理处主任。”

“哦，是主任，官还不小呢！”毛泽东风趣地说着。

这时，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也都相继下车了。毛泽东见他们靠拢过来，便一挥手，说：“走吧！”柳林溪领着他和中央领导同志来到景福阁的益寿堂。

在万寿山东部山顶的景福阁，乾隆时为菊花形的昙花阁，慈禧重修时，改建为景福阁。阁南向，前后各 5 间，有曲廊相通，四周曲廊满缀宫灯，远看如列星。凭栏四望，全山景色映入眼底。慈禧喜欢这个地方，每年七月初七在此祭牛郎织女；八月中秋在此赏月；九月重阳节在此登高，吃福、禄、寿、喜。盛夏伏暑季节，慈禧常在这里和后妃、宫女们押宝，推牌九，名叫“过阴天儿”。“过阴天儿”用膳时，由膳食房到景福阁，沿途排列许多太监，接连传递饭菜。按照规定，参加传膳的太监只能穿袍褂，不准用雨具，遇到狂风暴雨，就被雨淋得如落汤鸡。1948 年，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城时，曾在景福阁里举行和平解放北平城的谈判。

在景福阁的东北方有一所坐北向南的小住宅，这便是益寿堂。街门为垂花门，门内有益寿堂 5 间，东、西配殿各 3 间。四周围是砖墙，满墙雕刻花纹和博古文玩图案。

柳林溪将毛泽东引导到景福阁，安排好后想，毛主席劳累了一天，该休息了，于是他主动告辞，离开了景福阁。

但柳林溪没有想到，深夜 12 点多钟，毛主席打来电话，要柳林溪到景福阁谈话。

柳林溪便赶忙来到景福阁毛泽东的住处。

谈话很随便。毛泽东首先问柳林溪：“你是什么时候认识我的？”

柳林溪说：“1943 年时，在延安的行政学院、

自然科学院学习，多次聆听您的报告。”随后柳林溪又将他在延安几年的工作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听完很高兴地说：“那我们是老相识了。”然后，毛泽东话锋一转，问及颐和园的情况。

毛泽东博览群书，通晓古今历史，对颐和园的来龙去脉，以及几经沉浮的历史，非常清楚，所以他问的不是这些，而是颐和园接管后的情况。

毛泽东问：“颐和园接管了多少旧职员，多少工人？有没有太监？他们的生活怎样？”

柳林溪向毛泽东汇报说：我们接收旧职员 20 多人，工人 30 多人，没有太监。北平被包围时，全园职工生活比较清苦，连工资都领不到。个别职工春节都无法过。我们进城接管后，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即报告给市政府，从市财政局借来钱给职工发了两个月工资。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对原有职工的生活，我们要包下来，不要辞退，不要解雇，原薪是多少，就发多少。不要叫人家说，国民党时期我们有饭吃，共产党来了反倒没有饭吃了。如果那样就不好了。”

停顿一会儿，毛泽东接着说道：“过去我们在山沟里打游击有经验，进了大城市搞公园就不行了，没有经验，要向老工人学习嘛，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先把原有的公园管好。过去的公园是地主资产阶级悠闲人士逛的，劳动人民一没有钱，二没有时间逛公园。我们今后还要建设许多新公园，让劳动人民都能逛公园。在劳动之余，有时间在公园休息娱乐，恢复疲劳，再回到工作岗位上，为国家做更多的工作。”

毛泽东精力旺盛，这一夜，他们谈到很晚。

毛泽东在颐和园暂住几日后，便移居到香山的双清别墅。

香山，坐落在北京西北的山墩里，方圆 12 华里，古木茂密，群山环抱，山势自西、南、北三面向东逐渐递减，与玉泉山、万寿山遥遥相对。山中自然景色与依山势高低层层构筑的殿堂、庙宇交相辉映，是北京著名的森林公园。

在香山公园中有一座寺庙和行宫——香山寺。它建于金世宗太定二十六年（1186），元明清各代都有重修，初名永安寺，后改香山寺，亦名甘露寺。庙宇依山而建，由前到后，层层递增，正中一条石台阶串连着五座大殿。大殿两旁还有其他许多建筑物。香山寺被帝国主义侵略军焚毁后，改建为其他房舍。院中残存殿前大石屏一座，汉白玉石基座上镶嵌碑刻三方，阳面雕刻三座塔形图案，每一图案中又刻有佛教经典，阴面刻三尊佛像。两边石柱上刻有乾隆题联，一为“花雨轻霏结青莲法界；云峰郁起现白毫相关”。二为“智镜先圆宏亦度；心

莲香远滨亦乘”。

在香山寺内，有一眼水井，传说神仙常到这里取水炼丹，所以取名丹井。大殿前原有两棵以“听法”闻名的古松，后因香山寺坍塌而被毁。

在香山寺以南的山腰中，有一座依山而建的小庭院，院子的高坡上涌出两股泉水，晶莹清澈，乾隆在山泉旁的石崖上题了“双清”二字。

关于双清的命名，在京城广为流传过这样的一个传说：元朝忽必烈整日沉醉于酒色之中。一天，他无意中登高北望，只见西北方向红彤彤如地火上升，金赤赤似紫云降世，以为是神仙下凡，“福”从天降，于是，立即降旨，说要寻找“福地”，他坐上龙辇向西北而行，一直找寻到了双清这个地方。

那时的双清，既没有清泉，也没有建筑物，就是树多。树枝上挂满了红叶，把整个山梁装饰得红殷殷的，原来那红彤彤的地火，就是这满山的红叶。忽必烈见此，不免有些心灰意懒，再也不想去寻那“福地”啦，他也确实走不动了，便靠着红叶树干而睡，不一会儿便进入了梦乡。在朦胧中，他看见两只乖巧可爱的小白兔围着他的身边跑来跑去，他俯身去捉，这两只小白兔既不让他捉着，也不跳得太远，诚心惹他着急。忽必烈见此，便想出了一个主意，假装睡觉。小白兔又围着他的身边跑着跳着，他猛然伸手抓去，眼看要抓住了，可还是让小兔跑了。就在白兔消失的地方，冒出两股清泉。那泉水来势猛，涨势快，不多一会儿，竟然掀起浪头，劈头盖脑往下压，吓得忽必烈大叫一声，顿时梦醒。他马上命人就地往下挖，挖着挖着，猛地喷出了两股清泉，从此，人们就给这里起了双清的名字。

1917 年，河北发生水灾，督办熊希龄创办慈幼局，在这里修了一座别墅，称为双清别墅。

双清别墅淡雅幽静，院内山、水、树、石顺其自然，甘冽的泉水汇集一池，清澈涟漪。池边有亭，亭后有屋，因材借景，秀丽非凡。在这里，春日可赏花，酷夏可避暑，秋可观红叶，严冬可踏雪，这可谓香山之“园中园”。

毛泽东从颐和园乘上防弹汽车上了香山。

香山的公路是临时抢修的，小轿车爬坡相当吃力，虽然司机狠踩油门，但也无济于事。进香山大门不久，又遇到一个 70° 左右的大斜坡，汽车马达轰鸣作响，但车轮却是原地打滑。

坐在车中的毛泽东见此说：“上不去吧，那我们下来走好了。”

司机说：“那就烦请主席先下车，我把汽车倒回去，再往前冲一下，这样出不了事。”

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慢慢踩着夜色，顺公路到了香山慈幼园的后门。

一辆吉普车停在那里。

毛泽东问：“不是到了吗？为什么还要坐车？”

周恩来说：“还有一段坡路，小汽车爬不上去，只好换越野吉普。”

果然，越野吉普车又开了一阵子，才到了一个院子附近。

毛泽东下了车，仔细望了望双清别墅的大门，然后大步走了进去。院子不小，夜色下，一个古色古香的六角凉亭，还有不少松柏自由自在地站在院子里。一股清风袭来，树枝摇摆，似是在欢迎新来的主人。

“这个院子不错呀，比我们在西柏坡的院子还大还漂亮。”毛泽东很高兴地说道。

双清别墅的院子确实不小，房子也很大。它是一排坐北朝南的平房，屋子里阳光充足，房子高大优美。从西头起，有卫生间、卧室、办公室，中间正厅是会客厅，能容纳20多人。从正厅往东走，还有办公室和会客厅，过了会客厅是小餐厅，小餐厅通过一个走廊和厨房相连。

这排房子中，除毛泽东使用的房间外，还有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储藏室和小厨房。

从此，毛泽东住在这里，一直到6月份进城。但是，毛泽东只是白天去中南海办公，夜里仍回双清别墅或玉泉山休息。

在双清别墅，毛泽东于4月4日发表了《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重要文章。4月21日又在这里签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3日，我军解放南京，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还多次在双清别墅举行重要会议，研究讨论建国的方针大计。

毛泽东熟悉了双清别墅的环境，他在这里心情愉快，为新中国成立而忘我操劳着。他对双清别墅情有独钟。为此不愿离开，想长期在此居住。

但毕竟香山离城较远，且面积很大，再加上北平刚刚解放，社会还不是太稳定，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和今后工作的方便，劝说毛泽东进驻中南海的工作“艰难”地进行了。

毛泽东确实不愿搬往中南海，但由于众人三番五次地劝说，拗不过大家，最终走进了中南海。

四、菊香书屋的伟人

丰泽园建于清康熙年间，正门所悬匾额“丰泽园”三字，是清乾隆皇帝的御笔。康熙年间，曾占稻田十亩，其中演耕地一点三亩，是清帝演耕的地方。所谓演耕，乃是众臣扶佐，甚至代耕，皇帝本人只是装模作样地走走形式，并不真正亲自动手耕地。光绪十四年(1888)二月二十六日，光绪皇帝曾

经演耕于此，这也是清王朝最后举行的一次演耕礼。光绪的老师翁同龢在《翁文恭公日记》中，曾记载了演耕的热闹场面和气氛，“二月二十七日，上诣丰泽园演耕，已正一刻驾至黄幄少坐，脱褂摄衽。户部郎中嵩申进犁，顺天府尹高万鹏进鞭，翁同龢及孙贻经播种。孙贻经持筐，臣和实播之。府臣何桂执清箱，汉戈什爱班从御前侍卫扶犁，老农四人牵牛，凡四推四返毕，至幄次进茶还宫。”四个来回收工，哪里是什么耕地干农活。乾隆年间，大学士傅恒定平定金川，凯旋回京，乾隆为这次庆功，特别在丰泽园赐宴诸将，他自己还赋诗记盛。

乾隆在写丰泽园记中说，瀛台“较之此园圃为美观，而极土木之功，无益于国计民生”，丰泽园则行一事而合于天心，建一园而合于民情”。当然这话里渗透着封建皇帝的十足虚伪。丰泽园的建筑也绝不能说明封建皇帝的上仰天意，下俯民情。但如果说是瀛台上的建筑是飞阁流舟、金碧辉煌的话，比较起来讲，丰泽园里的建筑却还古朴敦厚，不尚华丽。

走进丰泽园的庭院，迎面是颐年堂，为丰泽园的主体建筑。院内东西厢房门上悬匾“云山画”、“烟雨图”，是慈禧太后的字。颐年堂在清朝时最初称崇雅殿，后改名叫惇叙殿，民国初年改名为颐年堂。

穿过颐年堂，来到东边的小庭院，这里名“菊香书屋”，康熙题联为：“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靠清净香。”院内十分清幽典雅。

北平解放后，住进菊香书屋的第一位中共领导人是林伯渠。当时，林伯渠居住在北屋。毛泽东和周恩来临时休息的地方，分别被安排在菊香书屋的东屋和南屋里。

下午进城。晚上在含和堂吃饭。8点多钟再返回香山住处。这是毛泽东的一天时间表。

为减少路途中来往的时间，为了安全，为了工作的方便，毛泽东从香山别墅搬到中南海，住到丰泽园里面的菊香书屋院内。

林伯渠、周恩来便从这座古老的四合院里搬了出去。

菊香书屋是南北向的，长方形结构，是北京标准的旧式四合院的建筑形式。有北房、南房和东、西厢房。

北房5间成一明两暗的形式，“紫云轩”匾额的房子是这5间中的当中一间，是个过厅。东侧的两间是通间，是毛泽东的起居室，成为东西向的长方形。西侧的两间有山墙的相隔，靠过厅的一间是江青的寝室。西侧的里间与西厢房相通，都是毛泽东的藏书室，是名副其实的书屋。穿过北房的过厅出北门，则是一个小小的院落，可以称为后院，与中海岸边上的马路仅一墙之隔。这个小院内有个

简易的防空洞，是进驻后由卫士挖的，但毛泽东从来没有使用过。

南房与北房的结构相同，也是5间。东侧的两间是江青的起居室，靠近过厅的一间是卧室，东边的一间是洗漱室，中间一间是过厅，南可去南院，北可去菊香书屋的院落。

东厢房也是5间。中间的一间是过厅，靠北侧的两间是通着的，这就是毛泽东的办公室，与过厅相通。靠南侧的两间不与过厅相通，也不在菊香书屋院内开门，而是开在东厢房东面的夹道内。这里是贮藏室，若去贮藏室，需要走出菊香书屋这个院子。

西厢房也是5间。挂“菊香书屋”匾额的过厅是西厢房中间的一间房子，南北两侧的两间房都不与这过厅相通。北侧两间是毛泽东藏书室的一部分。

北房外面的东头有个夹道。夹道西侧的房屋从南往北数，南侧两间是卫士值班室，北侧的两间是厨房。夹道的北头有个便门，走出去就是中南海西岸上的马路了。毛泽东去怀仁堂开会时，常从这个小便门出入。夹道的西侧北头也有一个便门与另一群建筑相通，去贮藏室时就从这个便门出入。从西便门走出去，经过弯弯曲曲的夹道是南海北岸上的马路了。警卫人员常进出此门，厨师运粮运菜大都经过此门出入。

南房的东头外侧也有一个夹道，它通往南院，这是毛泽东的孩子们及毛泽东和身边工作人员经常走的通道。

南院的东房是毛泽东孩子们的宿舍，准确地说是孩子们的集体宿舍。李敏、李讷、刘思齐、毛远新及叶子龙的两位千金都曾在这里住过。

出了菊香书屋直对面有一处西房，它曾是杨尚昆住过的地方。他乔迁之后，为了工作方便，保健医生住在这里。这里与菊香书屋之间是个青砖铺地的院子。院子的南面是颐年堂的北墙外侧，北面是放外国政府或朋友赠送给毛泽东的礼品的房间，相当于一个小小的展览馆。靠东头的房间是放乒乓球桌的地方，毛泽东在这里打过球。

与菊香书屋的西厢房北头相接的一处东房，是叶子龙的住房。在这东房前也呈一个院落，南面是礼品房的北山墙，西房和两层楼的北房则是机要室。

由于菊香书屋院内的柏树阴影，加上方式建筑的瓦房的飞檐，使得毛泽东的寝室和办公室内的光线很差，射进去的阳光很少。为此，一到秋末、冬、春季节，即使是在白天，也要借用灯光照明。

在毛主席的起居室，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张睡床了，床横摆在寝室的中间部位，引人注意的不是床的位置和大小，而是那床上的半床书籍。

在床头的铜质架上系着一个电铃的按钮，它通过电线一直伸延到卫士的值班室。毛主席常在醒后按动它，告诉值班卫士新的工作日开始了。

在紧靠床头的西侧放着一个小床头桌。桌上有一盏台灯，台灯戴着一顶大灯罩，以避免灯光直接刺激眼睛。在台灯的东侧，放着一个茶色的玻璃质的烟灰缸，烟灰缸旁边放着盒火柴。

靠近寝室的西墙山，有个旧的、普通木质的立柜，里面挂着几件平时替换的衣服，在柜的一侧，立着一个木质的三角衣架，上面挂着当日穿的外衣或大衣，裤子则放在靠近床侧的椅子上。此外，室内还摆放着两三把椅子备用，毛主席向身边工作人员交待任务时，常坐在这些椅子上。

在毛主席的办公室，西侧窗下放着一个东西向的大写字台，与西窗成丁字形。写字台面上有绿色的衬绒，在上面压着一张与写字台面一样大小的厚玻璃。写字台上的西头放着待办的文件，桌子中间部分的前边，放着文房四宝，办公用纸放在了与文件相近的地方。靠办公桌的中间地带还放着一个旧的、那种小学生用的脱了漆的铁皮铅笔盒，里面放着长长短短的十来只中等硬度的铅笔。

办公桌与南墙山之间，放着一把旧转椅，这是毛主席坐着办公用的。办公室的东墙山上没有窗子，紧挨着它的长轴，南北向放着一个长沙发。长沙发前顺放着一个玻璃面茶几，茶几两头一南一北各放着一个单人沙发，与长沙发合抱着茶几。

菊香书屋院里没有厕所。上厕所难不仅给这里的主人添了麻烦，也使来开会或拜访的客人很不方便。毛泽东上厕所，要走到后院里去。这段路，比现在北京四合院里的居民去公厕的路并不近。

工作人员和修缮队研究出一个方案：在紧靠毛泽东办公室后窗子的地方，按卫生间的要求盖一间平房，然后把办公室的墙打一个门，与卫生间相通。一个整体的配套房间就这样改造出来了。由于在办公室墙上打门是趁毛泽东睡觉时干的，毛泽东起床后突然发现办公室的新变化，非常惊奇，也非常高兴。

“你们谁想出的这个办法？”

“这是我们和修缮队一块研究的。”

“这样就方便了，你们费心了，谢谢大家。”毛泽东连声道谢。

后来周恩来也称赞这个卫生间搞得很好。

供暖设施对于北方的住房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菊香书屋院里的房子，以前是烧地炉子取暖的。因年久失修，火道不通，卫士们提出要装锅炉和暖气片。锅炉房设在哪里呢？太远了工程大，太近了又不安全。

选来选去，最后还是选在紧靠毛泽东办公室的一块空地，一个小锅炉房很快盖起来了。为了安

全起见,选责任心强的卫士负责烧锅炉。

毛泽东的卧室在北房,办公室在东房,从卧室到办公室去,必须经过院中心。晴天倒挺好,走几步路还可以活动活动,但刮风下雨时,尤其是冰冻路滑,就显得不太方便了。如果有走廊相通,最好不过了。卫士们又提出搞一个走廊。

尽管添个走廊很实用,但毛泽东不同意。他认为,花好多钱搞个走廊,与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相符。

毛泽东还铭记着他临进北平时的那句话:我们进北京,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

当时,丰泽园的大门和外面的门柱油漆都脱落了不少,有的柱角连里边的麻皮都露了出来。工人们搭脚手架,准备重新油漆。

“告诉行政部门,这里不需要刷油漆,过几年再修理吧。我住的地方不要和公共场所一样花那么多钱,搞那么漂亮……”毛主席制止了修缮工作。

然而,毛泽东对环境却别有一番情趣和审美意识,他宁愿将庭院种上青菜变成菜园,而不要花园,他曾经将庭院周围的花盆撤去而种上蔬菜。

自毛泽东住进菊香书屋,就将那些色彩斑斓的盆花拆去,只在院内十字路口处摆了一对常绿的棕树和一对无花果。

有一次,周子建安排工作人员打扫院中的杂草,毛泽东见了,匆忙制止:“莫拔莫拔,莫伤了无数生命。”

毛泽东喜欢绿色,诗人的情怀可见一斑;毛泽东热爱生命,敏感的心胸可见一叶。

五、中南海游泳池的故事

中南海游泳池的位置,在国务院办公区通往中央办公厅办公区的海边通道中间。

游泳池建于何年何月,无档可查,由此也就难以考证它建成的具体年代。但在民国期间的一张北京地图上,在其位置上画有一个小方格,并标着“游泳池”三字。这样看来,“游泳池”当属共和国成立前的产物。其另一个佐证,民国北平成立特别市,袁良在担任北平市长时,曾下令,在中南海游泳时,不得男女混泳,中间要有隔网,将男女分开。

中南海内的这一露天游泳池,在当年算得上是一个比较标准的游泳池了。长50米、宽25米,南深北浅。在深水区一边,还有10米跳台和3米跳板。在池子东边,搭有遮阳的布篷,散放着几把藤椅,是供游泳的人小憩的。池子的西边还设有看台,在看台四周围还摆了些大的盆栽观赏树,主要是石榴。更衣室也在这边。再往西有栅栏拦着,栅

栏那边是花圃和暖房。在露天游泳池游泳的人比较多,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一些领导人,中办、国办在中南海内工作的机关干部都对此游过泳。

经过多次“进劝”后,毛泽东入住中南海,适逢炎热的夏季,但他并不来这里游泳。其他领导人倒不时在此露露面。

副主席刘少奇常来光顾游泳池。刘少奇的泳姿当属最规范的了。他游的是标准的蛙泳,胳膊、腿划动的幅度比较大,游的速度也快。

建国初期,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于光远,在夏季暑气蒸人的时候,也到游泳池来泡一泡,降降温。他自谓:“泳技实在太差,上不得台面,也畏惧深水,只能在浅水区泡一泡。周围的人都在游或在学,受他们影响,我也又划胳膊又蹬腿地自学起来,可是划拉了半天总也浮不上水面。”

刘少奇见于光远在水中笨手笨脚不得要领,便站在游泳池边,对于光远进行耐心细致的指导,告诉他手脚要协调划动,才能游起来,刘少奇边说边给他做示范。

于光远照着刘少奇所说的要领,比划了几下,可并没立竿见影。刘少奇说:“不对,不对。你太紧张啦,要放松,放松才能浮起来嘛。”接着刘少奇又到水中给他做示范,并鼓励他不要着急,慢慢来。随后,刘少奇便到深水区游去了。

几天后,刘少奇来游泳池游泳,又看见水中的于光远。他停下脚步说:“呵,于光远,你别在水里泡着不动呀,来两下,我看看你游得怎么样啊。”于光远说了声:“好啊!”随后奋力游了起来,刘少奇看了于光远游的姿势,哈哈大笑起来,那动作的确不上档次。

于光远事后回忆说:“显然,刘少奇主席对我的长进大失所望,我当时就想:完啦,这辈子也学不会游泳了,连党的第二号人物亲自教我,我都学不会,那谁还能教会我呢?”

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游泳,确切地说,是他人“逼迫”。

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每天政务繁忙,而稍有闲暇,便手不释卷。毛泽东有个习惯,就是倚在床上读书。工作、读书,读书、工作,毛泽东的每一天除了工作就是读书,一点运动都没有,这样对身体健康极其不利。为了让毛泽东适当地进行体育锻炼,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负责他健康的医务人员,便想方设法琢磨几项适当的运动,哪怕是让毛泽东能伸展一下四肢,也能调节一下成天绷得紧紧的神经。

在工作人员的“开导”下,毛泽东同意散散步。每个周末到“春耦斋”跳跳舞。但他散步一般不出“丰泽园”小院的范围,跳舞也不能保证每次必到。大家觉得这样下去不行,这么小的运动量,不能达

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必须另寻其他办法。

想来想去,工作人员想出了让毛泽东打乒乓球。于是他们在“丰泽园”布置了一个乒乓球室,拉毛泽东去打乒乓球。可毛泽东对打乒乓球兴致并不太高,每次动员他打球,要费好大的劲,才能让他进乒乓球室。

只要把毛泽东拉进乒乓球室,他还是能够打两下的。毛泽东横握球拍,动作如初学者一样有些笨拙。无论是高球、低球、正向来、侧面来,他都以一种姿势阻挡回去,后来熟练些了,就能把球推到对方的左右两边,让对手疲于奔波。每当这时,毛泽东也会像孩子一样喜形于色,幽默地说:“杀你个顾头不顾尾!杀你个顾左不顾右!”

但毛泽东年纪大,不可能像年轻人那般灵活敏捷,动作协调。所以,身边的人和他打球虽然尽量给他容易接的球,但仍不免提心吊胆,怕他不小心跌倒,闪着或磕碰着。数日之后,工作人员便不再积极地拉毛泽东打乒乓球了。

还有没有更好的锻炼身体的办法呢?想来想去,大家觉得游泳是比较好的锻炼形式。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曾搏击长江,畅游北戴河,但其实不知,毛泽东最初来这里游泳时,也是费了很大周折的。

为了让毛泽东游泳,必须有个说客,让毛泽东接受这一锻炼形式,工作人员在充分研究之后,决定由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去当勇敢的说客。

一天,和毛泽东散步时,保健医生拐弯抹角地试探着问毛泽东:“主席,您说,地球上的生命起源于哪里?”

此话一出,毛泽东非常警觉地反问医生:“你想干什么?”

医生说:“谈自然科学的时候不能总是您考别人,也应该让别人提点问题呀。您说是吗?”

毛泽东看了看保健医生,回答道:“起源于大海。”

医生又问:“生命的最佳运动是什么?”

“散步,散步是最好的运动方式,人们不是常说,饭后百步走,人活九十九嘛!”毛泽东边走边说道。

“不对。”

毛泽东听到医生的回答,停下了脚步,扭过头,问道:“那你说什么样的运动方式最好?”

医生很认真地说:“是游泳。”

这圈子兜得够大的。然而这圈子也没白兜,毛泽东似乎在感悟着医生的话。在毛泽东向前慢慢地走了几步之后,毛泽东说话了:“游泳,游泳,好啊!我可以去游泳。”

这次“进劝”起了作用,毛泽东同意游泳了,于是工作人员开始为毛泽东准备了游泳衣。

或许许多数人认为,毛泽东第一次游泳,一定就

是在中南海的游泳池。其实不然,毛泽东进京后第一次下水,是在清华大学的室内游泳池。

在去游泳途中,保健医生对毛泽东说:“有我保护,保险出不了事。”

“喔,那出了事怎么办?”毛泽东不动声色地说。

“我救您。”

“你真能救我?你有那么大本事?”

到了游泳池,医生拉着毛泽东要从浅水处下水,可毛泽东却径直朝深水区走去。

“主席,不行!不行!”医生着急了。

“不是有你保护吗?难道你怕啦?”

毛泽东下水后,一会儿侧泳,一会儿仰泳,真是如鱼在渊。

到这时,医生才明白自己要充当毛泽东保镖的举动,是何等的自不量力!毛泽东对刚醒过神来的医生说:“我家门前就有个池塘,幼年的我就在那里游泳。那时,你这个生命还没有起源呐。”

从到清华大学游泳以后,毛泽东对游泳有了极大的兴致。他还总结出游泳的独到体会:“游泳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不想事,让大脑很好地休息。吃安眠药、散步、看戏、跳舞都不行,就是游泳可以做到,因为想事就会下沉,就会喝水。”

毛泽东称他真正学好游泳,是在1954年,而在此以前从来“就没有学好过”。毛泽东说:“1954年,清华大学有一个室内游泳池,每天晚上上去,带个口罩算是化了装,三个月不间断,我就把水的脾气研究透了……”

渐渐地,毛泽东更激起要到江、河、湖、海里去击水搏浪的雄心,但他住在中南海里的时候,还是常在中南海游泳池游泳。

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最初时间不固定,有时大家在游的时候他就来了;也有时大家都退场后,他才来游。那时,毛泽东和大家见面的时候多一些。

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只在深水区游,从不到浅水区。一般是先游个把小时,才到岸上休息。休息时,他总是披着他那打着补丁的蓝白条毛巾布睡衣,坐在藤椅里,一边抽烟一边喝茶,一边看着大家游泳。

要说泳姿,毛泽东游得并不很漂亮。半像仰泳半像侧泳。畅游之前,他习惯在水里打几个滚。然而他水性好,能做一系列别人难以效仿的水中的绝活。

毛泽东不仅潜在水里的时间长,还能既不浮出水面,又不沉入池底,摆出类似打坐的姿态静止不动地悬在水中间。毛泽东还能直立在水中,一动不动。

这也是毛泽东的水中一绝。

毛泽东在水中的休息，也多姿多彩。他能两臂枕于脑后，平躺在水面上，或仰视苍穹，或闭目养神，还能把一条腿翘到另一条腿上。有时他躺在水上吸烟，把烟灰缸就放在胸前。有时平躺的时间长了，他就会变个姿势。

毛泽东踩水也很特别，当用力的时候，整个腹部都能浮出水面。每看到毛泽东亮出他的精彩绝技，围观的人们便会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在一般的情况下，游泳的人们看到毛泽东下水后，通常会在池中让出一块空间或坐在池边观看毛泽东在池中自由地戏水。

每当出现这一情景，毛泽东往往不太高兴，挥动着双手，招呼大家：“这么大一个池子，就是让大家一块儿游的嘛！一两个人游有什么意思啊！人多才有意思嘛！”如果大家还不动，他就会突然游到岸边拉人下水。如果被他拖的人掉入水中，他就会开心地哈哈大笑。进入池子里的人多了，毛泽东还会和人家一起戏水说上几句话。小孩子们的情绪也被毛泽东的催促撩拨起来了，组织跑到跳台上，接二连三地为毛泽东表演跳水。

也不记得从何时起游泳池的管理员得知毛泽东要来游泳，就要进行清场了。游泳的机关干部们一听管理员招呼，就都上岸更衣离开游泳池。

干部们都知道，游泳是毛泽东的特殊休息方式，而且有时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因有急需处理的公务，也会追到游泳池来找毛泽东商议。为了不打扰毛泽东的特殊休息和处理突然公务，他们一听到招呼，就会自觉地退场。

而孩子们，则没有大人的顾忌和拘谨，常常不理睬管理员要求退场的招呼。有时管理人员告诉孩子们毛主席来了，赶快退场。可孩子们却想出各种伎俩，跟管理员周旋。

管理员清场一般是到游泳池边摇手铃。比较喜欢搞出点恶作剧的男孩子，就对管理员说：叔叔，我们帮你摇。可当他们拿到手铃后，却扑通扑通跳进水里，管理员追到浅水区，他们就逃到深水区；管理员追到深水区，他们又逃到浅水区，或者几个人传来递去。管理员对这些孩子是急不得也恼不得。

孩子们就以这样的方式，与管理员周旋。常常是正闹着，毛泽东就从他的更衣室里走出来了。孩子们都知道，只要坚持到这一刻，管理员便无计可施了。

毛泽东看到池中的孩子们，通常会微笑着说上几句话，要孩子们跳水，游泳。孩子们通常也会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走上跳台或跃入水中竭尽全力地展示各自的水中特长。

.....

由于身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喜欢游泳，

结果带动中共其他领导人也对游泳产生了很高的兴趣。一些不会游泳的人都以最快的速度，学会了游泳。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对毛泽东最忠诚最爱戴、肩负着保卫毛泽东安全责任的罗瑞卿。

1956年初夏，毛泽东在广州突然生出想到长江游泳的念头，并且动了念头就要马上做。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的罗瑞卿、王任重、汪东兴听了都坚决反对。他们认为长江水流急有漩涡，游泳太危险。特别是当其他的人见毛泽东态度执拗，语气有所缓和时，罗瑞卿偏偏还较真儿地反复申明不能冒这个险。

游泳的好兴致遭到了阻止，毛泽东不免烦躁，对罗瑞卿说：“你不让我游泳，无非就是怕我死在那个地方嘛！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这一问，使罗瑞卿十分不安地解释说：“保证您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所以我不能让您冒一点风险。”

但毛泽东还是坚持要游，罗瑞卿没辙了，亮出最后一招：“这事得向中央请示汇报后，才能决定！”毛泽东脾气也上来了：“你向谁汇报请示，中央主席就是我！”

那次闹到谁也挡不住了，只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先派人去探探水的情况。罗瑞卿本想在报告水情上做点文章，但在毛泽东面前还是通不过。他亲自点将让孙勇下水试探，试回来，亲自询问。孙勇下水试探上岸后，如实汇报说：危险不会很大。毛泽东终于尽了兴。

但是游了泳之后，毛泽东的气还没消。他对罗瑞卿说了几句一般人难以承受的话：“你不是说有危险吗？有什么危险？还不是你自己不懂水性，所以你不敢游？连泳都不会游的人，还能指挥军队？”毛泽东这一激，使罗瑞卿发奋学会了游泳。这一年是1956年，罗瑞卿已是步入知天命之年的人。

罗瑞卿学会游泳之后，每年夏天，只要他在北京，他就会到中南海游泳池来锻炼锻炼。他不光是自己来还带着孩子来。

几位老帅也会到中南海游泳池来游泳，朱德、陈毅、刘伯承也来游泳池游泳。

大约是在1963~1964年之间，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游泳的倡议，而且提出要到江、河、湖、海中去锻炼，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由此中南海的游泳之风更盛了。

许多觉得在游泳池憋气的人，也喜欢到自然水域去游泳。中南海是由两片天然海子构成的——中海和南海。由于中海的水底情况复杂，一直没有清理过，所以一直禁止游泳。想在更广阔水域畅游的人，便都到曾经清理过的南海去游。

南海的一个下水处在“丰泽园”西南的小码头。住在中海乙区的孩子去南海，或沿海边走，途

经“居仁堂”东墙、勤政殿、毛泽东居住的“丰泽园”外墙；或穿过刘少奇、杨尚昆等居住的十字廊、静谷，总之都是要经过甲区。因而住在乙区的孩子们到南海游泳，通常要由有甲区通行证的家长领着。

有了毛泽东的号召后，中海经过清理，也允许游泳了。水中筑起了几个方木台子，供游泳的人中途休息，可以不用上岸。海边还用苇席围起了几个简易更衣室，拉上水管，安上莲蓬头，游泳后即可冲洗一下。于是，水面大于南海的中海，顿时热闹起来。

1964年8月6日，毛泽东在一份给罗瑞卿的批语中询问：“部队中的大多数人都可以试验学游泳，军委是否已发出了指示？”不知是否是这个缘故，中南海警卫团的军人，成队地背着假枪武装泅渡。39局的工作人员背着成捆的电线负重游泳，许多原来对游泳没有什么兴趣的人，也被动员下水学习游泳。

中海乙区，有两个主要的下水处，在宝光门正东有个小亭子，下面是登船的小码头。驻守附近的中央警卫团几个区队的军官们，一般都从这里下水。

从宝光门东的亭子往北，百米左右，还有一个划船登舟的小码头。机要室、政治秘书室、39局的干部和孩子们，游泳时大都在这里下水。因为这里距西大灶最近，吃完午饭顺车道到海边，往左一拐就到了。

那时游泳兴比赛看谁晒得黑。游一会儿，就爬到方木台子上，或者上岸在岸边水泥护栏边上，趴着晒太阳。然后就比看谁黑，还用指甲在皮肤上划白道，看谁黑白反差大。

然而，孩子们并没有因可以在海里游了，就不再到游泳池去游泳。对孩子们来说，海里、游泳池里，各有各的诱惑力。

在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之后，好像要做表率似的，他本人也游得更勤了。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很少在南海或中海游泳，他的身影只是经常出现在中南海游泳池里。来游泳池游泳的人们，和毛泽东在游泳池碰面的机会，也多了一些。

1964年的一天，毛泽东悄然来到游泳池。这次他没有马上下水，而是先坐在池边凉篷下抽着烟，喝着茶，当起了旁观者。

这时，朱老总的夫人康克清，领着朱援朝、朱和平等孙子们也来游泳，她看见了毛泽东便主动走到毛泽东身边，和毛泽东握手，互致问候。

毛泽东向康克清询问起来老总的近况，并对康克清说：“酷暑炎热朱老总要注意身体，多休息。”康克清谢过毛泽东，就带着孙子们游泳去了。

过了一会儿，游泳的人看见毛泽东突然从藤椅上站了起来，大声说道：“你好啊！”人们顺着毛

泽东的目光看去，发现来人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两年前的夏季在中共中央的北戴河会议上，他曾因提倡“包产到户”，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主席好啊！”邓子恢和毛泽东边握手边问候。毛泽东指了指身边的藤椅，请邓子恢坐，服务员立即端上了茶水。

“听说你最近又下去搞调查研究啦，我们都老啦，要注意身体，要量力而行，不可太劳累了。”邓子恢只比毛泽东小一岁，大概有点耳背，所以毛泽东跟他说话，声音一直很大。谈了一会后，他们才下水。

毛泽东那天兴致挺好，游到人多的地方，和大家交谈。人们纷纷赞叹毛主席的水性好。毛泽东说：“游泳没有什么诀窍，要勇敢些，多练习，就定能够学会。喝两口水不要紧，重要的是要坚持。”

毛泽东游泳一直穿白色的游泳短裤。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再次畅游长江时，还是穿白色游泳裤。到了60年代末，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对他说：“您一生喜欢游泳，但却没有一条像样的游泳裤，还是做一件吧。做一件红色的，漂亮的怎么样？”毛泽东一向生活俭朴，很少做新衣服，但这次他笑了笑，点头同意了。从这以后，毛泽东在游泳时，便穿上了红色游泳裤。

六、游泳池，毛泽东最后的10年

毛泽东在丰泽园菊香书屋住了18年。

在一次外出视察时，丰泽园进行了修缮，一向保持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的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回到中南海丰泽园时，发现丰泽园变了模样，为此动了肝火，一气之下，不再进驻丰泽园，搬到了“游泳池”。

从1970年元月起担任毛泽东的专职摄影记者的杜山记述了他第一次去“游泳池”的印象：

……

毛主席的住宅是很普通的平房，面积也不大，却有个十分响亮也十分奇怪的名字“游泳池”，好像毛主席整天都呆在游泳池似的。其实，主席因身体缘故，早不在住宅旁的游泳池里游泳了，后来干脆不放水，给池子上盖上木板，又加了个顶棚，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厅。可红墙内外的人改不了口，仍管毛主席住的地方叫“游泳池”。

我走到这幢普通却不寻常的平房前，决然料不到它是毛泽东一生最后10年的住处。

毛泽东的客厅也兼书房。我第一次走进时，因为充满好奇神秘，目光不由得环顾四周。书房里的情景并不像我脑海里所想象的那样富丽堂皇，明光闪亮，甚至有点灰暗、陈旧，厚厚的紫色窗帘挡

住了户外的阳光，屋里亮着灯，使得本来就很简朴的陈设愈加简朴。构成灰色主调的要算那贴满墙壁的线装书。一排排一层层一摞摞砖头似的书摆满了环屋的书架子，许多书里还夹着白色的纸条，这是读书人留下思考和阅读的记号，猛一看还真像商店货架上的价码标签。

除了惊人的书“海”外，醒目的陈设要算客厅中间摆成月牙形的沙发和挤在沙发之间的三角茶几。沙发旁摆着落地台灯，茶几上整齐地放了一摞纸巾、国产烟、青瓷烟缸和青瓷茶具，茶几下面有几只白色痰盂……一切都非常普通也非常亲切。

毛泽东在这“游泳池”住了近10年。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河北省唐山市发生大地震。

4时50分左右，张耀祠来到毛泽东的会客厅。他通知小张(张玉凤，毛泽东的秘书)、小孟(孟锦云，毛泽东的护士)：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根据预测，近期很可能还会余震。主席目前住的房子不太牢固，需要马上搬家，搬到新建的202房间，那所房子安全些。

孟锦云根据张耀祠的意见，对毛泽东说：“主席，汪东兴、张耀祠来过了。他们讲了这次地震的情况，还讲您现在住的这所房子不太结实，可能还有余震，希望您赶快搬家。”

毛泽东听后，对搬家的事没有表态，却紧接着问：“这次地震情况怎样？有没有简报？”

孟锦云听到毛泽东询问有关地震的情况，便赶紧把刚刚送来没多久的一份简报清样拿来给毛泽东读了一遍：

“……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7月28日3时42分发生强烈地震，天津、北京市也有较强震感，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为7.5级，震中在北纬39.4度，东经118.1度，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毛泽东听后，显出一种少有的焦虑。沉默一会儿，长叹一口气说：“7.5级，大灾难啊，要全力救灾，这是最要紧的。”

孟锦云听了毛泽东的话之后，停了一会儿，又问他搬家的事怎么办。毛泽东只是挥挥手，表示不同意搬。

张玉凤、孟锦云几次劝说毛泽东搬家，开始他还回答几句。但后来几次，他不是根本不回答，就是像是根本没听见似的，或是摇摇头，弄得她俩也毫无办法。

到了7月31日上午，汪东兴又找了小张小孟，商量劝毛泽东搬家的事。无论如何，也要劝他尽快搬出，不然，发生危险，可没办法向全国人民交待。

孟锦云只好硬着头皮，再次劝说毛泽东：“主席，我看您还是搬家好，您不害怕，我们还害怕呢，您也替我们想想。”

孟锦云故意用这样的话去激毛泽东。没想到这个办法还真灵验，毛泽东听了这话，没有摇头也没有摆手，而是闭上眼睛沉思一会儿，然后说：“你们怕，那就搬吧。”

毛泽东终于被说服了。他同意搬家的消息，几分钟后传到了汪东兴、张耀祠那里，二十多分钟后，搬家就开始了。

所谓搬家，其实比一般人搬家简单多了。紧挨着游泳池老房的“202”房子，虽然毛泽东一直未搬进去住，但一切都按随时来住在管理着。每天打扫卫生，开窗换空气，调节温度，里面的一切设施齐备，只要进来就能住。

1976年7月31日上午，毛泽东搬进了202新房。

1976年9月9日零时。

毛泽东的卧室202房间，抢救小组的医护人员在紧张的工作中。

在毛泽东卧室去大厅的走廊通道上，那宽宽的通道里，电视荧屏正显示着毛泽东心脏跳动的情况。一道波浪式的曲线在起伏着，在抖动着。

零时10分，荧屏上的曲线突然变成了一条直线，一条微微抖动着的直线。

几分钟过去了，荧屏上一直是一条直线，一条仍在微微抖动着的直线。

毛泽东与世长辞了。

9月10日夜间12点钟，毛泽东卧室外面开来了一辆大型灵车。用黑绸子制成的黑花缀在车前，花的两边垂下黑纱，车后部，整个是打开的。

中南海干部们的同志们，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将毛主席遗体抬起来，放在一辆平板小车上。由一个人推着小车，把遗体送出了卧室，送上了那辆灵车。

灵车从中南海西门缓缓开出，后面、前面有十几辆小车护送着。

毛泽东于1976年9月11日的深夜，永远地离开了他生活了28年的中南海。

永别了中南海，永别了丰泽园，永别了菊香书屋，永别了游泳池老房，永别了202新房！

灵车队，在中秋的深夜里，在府右街的路上，缓缓前行，向着人民大会堂移动。

灵车在人民大会堂正门停下，毛泽东遗体被抬着放在大厅中央的、早已摆放好的平台上。紧接着一面火红的党旗，轻轻地盖在毛泽东的遗体上。接着，又盖上了水晶玻璃棺罩。

毛泽东离开了中南海，他老人家将在人民大

会堂接受亿万人民的凭吊。

七、周总理 25 载西花厅

西花厅，在中南海的西北角，西北两边临街，是一个不大的院子。这是清朝摄政王府西花园的后半部分，地处中南海内中海西岸紫光阁西边。明末清初，中南海的这一带宫垣颓坏，殿址湮没。1908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去世。醇亲王载沣的幼子溥仪继位，年号宣统，载沣成了摄政王。宣统元年，在这里修建了摄政王府。王府的建筑分中路、东路、西一路、西二路，最西面叫西花园。西花园又以西花厅为中心，分为前后两院。前院的主建筑就是西花厅，是举行会议或见客的场所。

周总理最初来中南海时，是住在菊香书屋东面的两间，西面两间住的是林伯渠。毛泽东从香山搬到中南海，周恩来把里院让给了毛泽东，自己迁到中院居住和办公。不久，江青也要搬来，周恩来又让出房子，搬到前院的东厢房。不过长此下去不是办法，必须另找住地。之前，周恩来曾经到过西花厅。西花厅的院子里正逢海棠花盛开，似乎伸出了欢迎的胳膊。周恩来特别喜欢海棠花，他说海棠是“群花”。这样，他选中了西花厅，搬到这里住，一住就是 25 年。

在西花厅，厅房西侧有门通里院，门侧的房子和厢房是秘书和警卫员们办公的地方。里院的中间正屋，是起居室和餐厅，东屋是周恩来、邓颖超的卧室，西屋是周恩来的办公室。

西花厅，这座清代皇家建筑，看上去似乎富丽堂皇，郁积着贵族气息，但定睛细看，就会发现，门窗檐柱上已油漆斑驳，露出陈旧的木质，那骄横盛世的皇家气息已被岁月风化，变成漫长历史演变的物证。那青砖地面，由于年头久了，到了夏天便泛潮泛碱，使墙角一圈也能看见白碱的印痕。

刚解放时，还没有壁纸，墙壁虽然喷了浆，由于泛潮，很快就都变成灰黑。房间里光线也较暗，那种阴湿昏暗的感觉，比现在普通人住的公寓要严重得多。天花板也很陈旧，像上了年纪的老人的皮肤一样缺少光泽。

室内陈设更为简朴。办公室里有一张两面抽屉的办公桌，那是 20 世纪 40 年代诞生的老式桌子，已经很旧。桌前一把转椅，周恩来坐不惯，后来又换成了四条腿的靠背椅。

办公桌一侧，还有个长条桌，不带抽屉，铺一层绿呢子布，上面摆了烟缸和茶杯。长条桌两边各摆四个凳子，两头还各有一个凳子，周恩来随时召集副总理或各部部长来办公室，都是围着这张长条桌子开小会或谈话。

靠墙壁，正中间有一个简易木架子，木架上铺了周恩来在解放前用的毡子，上面端端正正摆放着毛泽东的半身石膏像。石膏像两边各摆一个书柜，办公室两头还有书架。书架上的书主要是马恩列斯著作、《毛泽东选集》、《干部必读》及《辞源》、《辞海》等工具书。

周恩来的卧室陈设更为简单。他睡一张双人木板床，上面垫一层棉花套，然后是一条普通的棉布褥子。被子也是普通的棉布被。他不喜欢花布，喜欢素淡。被面是豆绿色的平纹布，被里是普通白布。开始他使用的是荞麦皮枕头，后来出国，工作人员悄悄帮他买了个长方形海绵枕头，替他换了。由于这一“新事物”所费无几，他接受了。

木板床的两边很“热闹”。床头两把椅子，脚下两把椅子，四把椅子如“四星望月”般围拱着大木床。因为卧室里没有衣服架，脚下放两把椅子是睡觉时放衣服用，床头两把椅子则是上床批阅文件时，放置文件用的。

“大跃进”开始之前，周恩来特别忙，有时上了床，还要继续办公五六个小时。躺在床上办公，吊灯的光线不适宜，为了借光，周恩来不得不保持某种躺卧的姿势和角度，但长此下去，很疲劳。工作人员见此，便小声地向他建议：“总理，买个台灯或落地灯吧，这样有利于办公。”

周总理沉思了一下，点了点头，但随后又说道：“自己用，不要什么高级的，不要麻烦宾馆，要按传统办。”

工作人员一怔，问道：“什么传统？”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周恩来笑着说，“一个落地灯，很简单，自己动手做。”

结果，他请中南海的工人用铁管子自己做了两个落地台灯，卧室床头摆一个，办公室摆一个。是 30 瓦的日光灯，用洋铁皮打的灯罩，用了几天，那洋铁皮反光，晃眼晃得厉害，他让工作人员在灯罩上刷了层绿漆，从此，这两个落地灯便再没有动过地方，一直陪伴他住进 305 医院。

由于地面潮湿，周恩来常闹腿疼，办公室的地毡由于潮湿而生了虫。老卫士长何谦心疼周恩来，跟邓颖超商量后，找到周恩来建议道：“总理，这些房子太旧了。按照正常情况也该维修了，否则会损坏的。”

周恩来觉得有道理，想了想说：“正常维修还是必需的，这些房屋都是国家财产，不能损坏。”

何谦马上又建议：“那么我们安排一下，利用你外出的时候搞。”

周恩来点头表示同意。但又接着说：“这件事由你来负责。但这是正常维修，一定不要铺张浪费，哪坏修哪，要尽量节约。”

时间不长，周恩来到南方视察，何谦便留了下

来，负责房屋的维修。

何谦首先指挥工人将潮湿的铺砖地改成了地板，并且换了新地毯。窗帘太薄，夜里不隔凉，就换成了呢子的。卫生间也需要改建，于是便将盖钓鱼台国宾馆时剩下的澡盆搬来一个装好，这种澡盆子底子平，有扶手，对老人来说很适合。屋子里的家具太简陋，办公室里连个舒服一下身体的沙发都没有，就从宾馆储备的沙发中挑两个搬了来。

邓颖超的房间也太简陋，连一般女同志都有的梳妆台也没有，他便为邓颖超置了一个梳妆台。房梁年久已经腐朽，便换了梁，并且重新油漆粉刷一遍。这些事办完了，他各个房间走了一圈，心里算算账，觉得实在算不得铺张浪费，每一项工作都是有理由的。

可他没有想到，一场严厉的批评马上就到了。

周总理从南方回到北京，回到中南海西花厅，一进家门就怔住了。

周总理皱起眉头，目光像机枪手寻找目标一样飞快地扫着地板、地毯、窗帘、沙发以及油漆粉刷过的房屋。接着便退出了门。

“何谦，何秘书！”

“总理，我在这儿。”

“这花了多少钱？”

“不知道……”

“何秘书，你也是老同志了。我临走是怎么交待你的？为什么搞得这么铺张？国家正在困难时期，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的？是谁的主意？”

“是我的主意。”

“你要做检查！”周恩来发火了。

“可是，房子潮，你夜里办公……你在南方，我想给你打长途，但想一下子也说不清，我就做主了。”

“你不用解释了，这个错误是明摆着的！”

何谦跟随周总理多年，他非常了解周总理：你错了，不要解释，痛快地认错，他一般不生气，可你越是解释他反而气越大。

“总理，我考虑不当，是我错了……你先进去休息。”

周总理听后，把手一摆，严厉地说：“你算算花了多少钱，我自己赔！”

何谦小声地说：“你赔不起，你才收入多少？你和颖超大姐的工资合起来也不够……”

周恩来怒气未消，便指着那些新添置的东西说：“那就把这些东西统统搬走，否则我不进！”周总理说完，真地走了，住到了他办公和接待外宾的地方。

这下何谦可着急了。他急忙去找陈毅。他觉得陈毅与周恩来关系密切，友谊深厚，又会讲话，机

敏而幽默，由他劝说周恩来，准行。

“啥子了不起的事嘛，我看只是修了该修的地方嘛。”陈毅看完装修过的西花厅后，信心十足地说，我一定把周总理劝回来。

陈毅去了钓鱼台，来劝说周恩来。但还没说几句，周总理就把陈毅给挡了回去：“你不要说了，现在跟我一起到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去。”

那时，每星期开一次国务院办公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我这次去南方视察，家里花了那么多钱替我修房子，我做检查是应该的。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多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我心中不安。”

不仅国务院办公会上讲，平常的汇报会、生活会、计划工作会议，大会小会逢会就讲，做检讨。几乎国务院的干部全知道总理“犯错误”了，都听到了他的自我批评。

由于周总理反复检查，副总理和部长、副部长们都以为工作人员把周恩来家修成什么不得了的宫殿样子了，便纷纷来到西花厅。他们看后感到震惊。房子都是修了该修之处，并无奢侈之感，甚至还不如某些部长和省委书记的住房好，而周恩来却如此看重这件事，那么，谁还敢乱花钱修造住房？

何谦见总理不回家，心中非常焦急，他多次做出口头和书面检查。他说：“只要总理肯回家，在西花厅住，给我什么批评都有行，给我什么处分我也没意见……”

周总理见到何谦的检查后，很受感动，便把何谦叫到钓鱼台他的办公室。

何谦来到钓鱼台周总理办公室，很伤心地垂着头。周总理见状，上前抓住何谦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对我应该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的房子搞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你不要只听人没说什么，说只修了应该修的，不同的意见肯定也是有的。而且，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我还怎么说别人？这个头就是我带的，都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你为什么没想到？现在呢，我搬进去住，我心不安；我不搬去住吧，你们心不安。你们这么搞对谁也不好啊……”

别无选择。将西花厅的地毯、沙发、窗帘、梳妆台、灯具等等凡是能搬走的全搬走，恢复原来的旧东西。只剩下地板没法拆，澡盆用水泥抹死在卫生间里了，这些东西要想搬走就得“搞破坏”了。

向总理汇报时，陈老总帮了忙：“油漆要不要刮掉啊？那就不是节俭而是更大的犯罪喽。”

总理被逗笑了。至此，周总理才重新搬回西花厅，回到他家里。

1965年，随着国家经济形势逐步好转，工作人员又动了修缮西花厅的念头。

西花厅的前院有个水池子，有条小长廊。周总理说：“我们号召人民节约一滴水，一度电，怎么能为我一个人浪费一池水？”所以那水池子从未放过水，而成了工作人员种试验田的地方。

小长廊破旧不堪，油漆剥落，木料干裂。工作人员便向周总理汇报：“总理，西花厅的木建筑必须保护，现在需要修理。从爱护古建筑讲，也该修修了。水池子也该放水，改变一下环境，增加点空气湿度，对木建筑也能起保护作用。”

周总理听说保护古建筑，痛快地点头答应说：“有道理，可以搞一下。但一定要自费，不准花公家的钱。这里现在是我住嘛。”

工作人员赶紧通知有关部门，修缮人员来后，看了看西花厅该修缮之处，算算账，说需要2万元。

工作人员一下愣住了。“2万元！总理和邓大姐的全部存款只有2千元，差一位数呢！”

“总理，人家说维修一下要2万元呢……”

“咱们有多少钱？如果差得不多，我可以找陈老总借点。”

“差一位数，咱们只有2千元。”

“差那么多！”周总理沉吟一下，说，“暂时放下吧，以后再说。”

就这样，周恩来总理居住的西花厅，因钱不够，便没有修缮，直至他逝世，院里屋里都再没有修过。

1974年6月1日中午，身患癌症的周恩来总理走出了中南海西花厅，走出了他曾居住了25年的西花厅，住进了解放军305医院。

这一走，周总理便没有再回来。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伟大的总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八、昙花一现的“向阳厅”

1966年8月18日，林彪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发表了煽动性的讲话，说“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从8月20日起，首都一些红卫兵走上街头，张贴大字报，集会演说，开始了“破四旧”、“立四新”的行动。

一些带有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色彩的商店字号，在他们的宣传、帮助下，更换为具有革命意义的名称。他们向各学校革命

师生倡议，迅速改掉一些毫无政治意义的学校名称。他们还向广大服务行业的革命职工倡议，决不再给某些顾客理怪发、做奇装异服、出售和出租黄色书刊。他们要把北京彻底改造成为一个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的北京。

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在市内主要街道的墙头上，贴出充满革命豪情的向旧世界的宣战书。宣战书说：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冲击着资产阶级的各个阵地。资产阶级的温床保不住了。“飞机头”、“螺旋宝塔式”等稀奇古怪的发型、“牛仔裤”、“牛仔衫”和各式各样的港式衣裙以及黄色照片书刊，正在受到严重的谴责。我们不要小看这些问题，资产阶级复辟的大门，正是从这些地方打开的。过去17年来，前北京市委对这些事情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基本禁止改革。他们走的是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路。我们和他们是两条路上的人。他们不管，我们要管，还要管到底。我们一定要堵住一切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决不留情。

红卫兵破“四旧”是从给街道、工厂、公社、商店、学校、机关等设施改名开始的。

8月20日后，北京市的公共汽车站牌都被红卫兵涂上了“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旧站台，建立新站名”的标语。

红卫兵将长安街改称为“东方红大街”；外国大使馆集中的东交民巷被改为“反帝路”；苏联大使馆所在的扬威路改成了“反修路”；繁华的王府井大街改成了“防修路”；东安市场改成了“东风市场”；亨得利钟表店改成了“首都钟表店”；悬挂了70多年的全聚德烤鸭店招牌被摘下，店名也被更改为“北京烤鸭店”；同仁医院更改为“工农兵医院”；协和医院被改为“反帝医院”；荣宝斋被改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清华附中改成了“红卫兵战校”；景山公园改为了“红卫兵公园”；颐和园改为了“首都人民公园”；天桥剧场改为了“红卫兵剧场”；中华影院改为了“红卫兵影院”……

一时间，改名狂潮席卷全国。

就连中南海“西花厅”也被改成“向阳厅”。

1969年，摄影记者杜山到西花厅向周总理报到，在西花厅门口见到这样一件事：

走进中南海，就遇到一件啼笑皆非的事情，西花厅已被造反派改成“向阳厅”。这是一个多么俗气却又十分时髦的名字啊！正如全国数以万计的“文革”婴儿叫向阳一样。

然而改掉几百年历史的名字是很难像为初生婴儿起名那样一劳永逸终身受用的。“西花厅”无法让人彻底忘掉，叫来叫去还是“西花厅”。昙花一现的“向阳厅”很快就被人们忘记了。

“西花厅”改“向阳厅”这只是那个奇异年代的

奇异缩影。患“精神恐惧”的意识障碍正是那个年代里一大奇异特征之一。

如今西花厅依旧在。但凡是去过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的人，只要留心一下，就会发现这里的院门只有两座“墙垛垛”，它的上方空荡荡的，没有“拱顶”。为此，中南海西花厅的院门为啥一直没盖“拱顶”也就成了人们心中的谜团。

说起西花厅的院门，这与何谦有关。

那是在周恩来总理去南方视察之前，何谦建议将西花厅修缮一下。周总理同意了，但叮嘱何谦要厉行节约。

周总理走后，何谦便赶紧召集人马，抢修西花厅，他们修缮完周总理的办公室后，又决定把西花厅的大院门也整修一下，在上面架上一个拱形过顶，使之与中南海内的其他建筑相协调，也便于保卫工作。可不想，建筑工人们刚刚砌好西花厅大门处的两个“门垛”时，周总理回到了北京。

当他看到修缮后的房间后非常生气，严厉地批评了何谦，并立即制止大门的修建。

所以，直到如今，西花厅的大院门还是竖着两座光秃秃的“墙垛垛”。

从这一点，我们也可看出，周恩来厉行节约、心系人民的伟大风范。

九、含和堂主人的兰花情

说起朱德元帅，多数人都知道他戎马一生，与毛泽东并肩战斗，打了无数次大的胜仗，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

其实，朱德元帅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也可称为书法家。他的笔力凝重、遒劲，独成一派。

朱德元帅练习书法，是在年事已高之年。他的韧劲、毅力惊人。无论在什么环境，无论工作多忙、多累，多年坚持不懈，天天都要写上几张，而且每张每字都写得非常认真。有时身边的服务人员担心他累了，劝他休息。他总是慈祥地一笑，取下架在鼻梁上的老花镜说：“业精于勤荒于嬉。”古往今来，世代文人墨客无不酷爱文房四宝，有的还以家藏古珍砚纸墨笔的多寡来论及雅俗。朱老总虽然喜爱书法，但却从不接受别人馈赠的笔墨纸砚，凡是他所用的东西，也没有一样不是花钱买来的。

生活困难时期，宣纸一时紧缺，有时买不到。由于他每天都要练习书法，纸便成了一个大问题。

有一天，他突然发现写字台上读过的《参考资料》，顿时挥笔在上面写起来。一着墨，笔感很好，吸水性极强，其效果与宣纸的效果差不多。《参考资料》一日两本，天天都有，可谓货源充足，取之不竭。打那以后，他就开始在《参考资料》上练习书

法。他还风趣地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废纸上练习书法有两大好处：一是节省纸张；二是可以重温旧新闻！

说起老总练习书法还有一段小故事。

朱老总曾一度患右臂病痉症，经多方治疗仍时愈时犯，轻时抬不起手臂，重时能痛得浑身冒冷汗。

一次，正在朱老总的右臂疼痛时，一位懂得中医的保健医生说，疾病三分治，七分养。养又分静养和动养，是动是静取决于所患疾病的部位和病情程度。比如患肩周炎的人适当活动活动手臂是有好处的。

朱老总听后，经过考虑，决心练书法来锻炼臂力。先少写后多写，逐日加码。起初，不太适应，臂痛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工作人员见状，便建议他不要再练了。朱老总说：“万事开头难嘛！黎明前夕还有一段黑暗，只要坚持冲过去，前头就是光明嘛！”

朱老总练习书法，坚持了一年之后，右臂的疼痛果真有了好转，且书法也大有长进。再后来，手臂康复了，这使朱老总很开心，很高兴。他说：“写字运笔要全身运动，做到聚精会神，才能凝力于笔端，气贯于双臂，才能起到强身健肌的作用。”

中南海里的一位机要秘书，酷爱书法。一次，他给朱老总送文件时，有幸品鉴了朱老总的书法。事后，这位秘书说：“把朱老总的字挂在墙上，我退后几步，一字一句地往下看，一笔一画地品味着，汲取其中的技巧。单从字形来看，就显得非常饱满，尤其是点笔，似水流，晶莹剔透，疑是琥珀一般。从笔力上看，更是刚柔相济，遒劲有力，有入木三分之感。通篇字体大小相融，搭配得当，看后如观瞻一首清秀隽永的诗句。”

朱老总不仅喜爱书法，同时也擅长诗词。80高龄那年，他还拄着拐杖参加诗歌讨论会。会上他见诗人有些拘束，正好这时郭沫若来了，他就谦和地称郭老为大诗人，请他先带头发表意见。一向很浪漫的郭老连连推辞，幽默地说：“大元帅在上，老郭不敢说诗。”话一出口，满堂全笑，紧张的气氛顿消，于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

在含和堂有个小花房，里面摆满了朱老总亲手培植的各种花木。其中兰花的种类和盆数最多。

兰花又称“春兰”、“山兰”、“草兰”、“朵朵香”，野生于我国南部和东部山坡林阴下，也是我国栽培历史悠久的盆栽观赏植物之一。它美而质朴，素而淡雅，幽香怡人，很久以来被世人所爱，并视为美的化身，称为“花中四君子”。

朱老总对兰花特别厚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关于朱老总养兰，还有一段沉重的往事：

据老同志讲，他的亲密战友伍若兰，是井冈山

时期红军里与贺子珍齐名的巾帼英雄。一次，她所在的部队与敌人遭遇，经过激烈的战斗，终因敌众我寡，部队被冲散了，伍若兰同志不幸落入敌手被杀害了。她死得刚烈、英勇。朱老总得知她牺牲的消息后非常悲痛，很怀念她。他把她比作兰花，生于深山，长于深山，朴素淡雅，幽香高洁，不惧严酷。此后他就有了养兰的习惯。半个多世纪来，无论是被敌人封锁在消息闭塞的井冈山，还是在艰苦的长征路；无论是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沸腾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一直喜爱兰花。新中国成立后，他还风尘仆仆从几千公里外的北京到井冈山故地重游，他走在随行人员的前面，翻了一山又一山，越了一峰又一峰，浑身被汗湿透了，同志们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劝他不要再爬了。可他连头都不回，仍一个劲地往前走。原来朱老总在满山遍野寻找当年的井冈兰！

他爱兰，养兰，也喜欢收集兰花良种，凡遇到好品种他总要带到北京，精心培植养育。养得多了，他就利用外出开会、视察之际分送给各地各部门，有时也把它作为一种高雅的礼品，连同“兰华谱”赠送给友人。

十、福禄居 少奇教子

位于中南海甲区的刘少奇住房并不阔气。这是一幢旧式住房，共有三间，一间是办公室，一间是会客室，一间是卧室。因年久失修，都已十分破旧。由于房间窄小，曾有不少同志建议把这里扩建一下，以适应办公需要，可少奇同志始终没有答应。

后来，管理部门给刘少奇调了好一点的房子，使他成了毛泽东的近邻。这所房子是居仁堂一组建筑中的一所两进小院，名为“福禄居”。

刘少奇搬进福禄居后，上房作办公室和卧室。他的办公室很简单，除了办公桌、书架、文件柜、一对沙发、一把藤椅，没有地毯，更没有什么可供欣赏之类的摆设。在不到2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光是西面的一堵墙就有4个大窗户，到了冬天，西北风一刮，窗帘像波浪一样飘动，室内温度很难升上去，刘少奇办公时还要穿棉鞋。一到夏天，太阳西照，又特别热，既无空调，也无电扇，他有时只穿一件背心办公还满身大汗。

刘少奇的卧室也很简单，除了床和书架以外，只有两个凳子，四五个人进去就显得拥挤。有时夜间一两点钟，周恩来有急事和他商量，工作人员就直接引到卧室。有一次，跟着周恩来来了三四个同志，卧室里就没有地方坐了，有的坐在床上，有的干脆就站着谈。工作人员要去搬几个凳子，周恩来

说：“不用，不用，很快就谈完的。”可是谈着谈着，几十分钟就过去了。多年的工作，给工作人员一个深刻的印象：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脑子里装满国家大事，为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快点富强起来，有一种紧迫感和高度的责任心，只要能办公，什么时间、地点、条件、形式，他们从来都不讲究的。

刘少奇全家人的吃穿，同样十分俭朴。刘少奇在家里穿的都是普通布衣，有的由于年久，都洗褪了颜色，衬衣总是穿到无法再补了才肯换新的。吃饭更简单，尤其是夜间那顿饭，常常是把中午剩下的来个一锅烩。因为用饭时间都是在半夜12点以后，为了照顾厨师的休息，刘少奇叫王光美做这顿饭。所以，工作人员开玩笑地称王光美是“烩饭厨师”。

1952年以前，中南海的生活设施还很简陋。刘少奇每天喝水，都是警卫员在煤球炉上烧的开水；洗澡用水也是一个很旧很小的锅炉烧的。刘少奇为了节省煤，一星期只洗一到两次。

1959年国庆期间，刘少奇亲自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家庭会议，参加的人有王光美同志，还有几个孩子和亲戚。秘书刘振德也参加了。

关于这次家庭会议，刘少奇的秘书吴振英、刘振德在他们的回忆文章《跟随少奇十九年》一文中这样写道：

少奇同志工作那么忙，为什么要亲自召开一次家庭会议呢？原来，有些本家和亲戚看到少奇同志当了国家主席，就到北京来找他为自己办点事：有的不想当农民要当工人；有的不安心农村要进城市；有的想要点东西，等等。不给办，还有埋怨情绪。少奇同志认为有必要做些思想工作，纠正他们的错误观点。

少奇同志说：“今天，请你们来开个会。这个会议室是我主持政治局同志开会的地方（这个会议室十分窄小，除了一个长条桌子和墙上一张大地图以外，什么摆设也没有。桌子周围坐二十来个人，就没有多余的地方，从开会人的背后，只能走过一个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嘛！什么矛盾呢？你们以为我当了国家主席，给你们点方便，给你们点东西很容易。但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致，这就是个矛盾。有了矛盾就要正确处理。现在解放了，在农村的也好，当工人的也好，生活都比过去好多了。当然完全的平等，现在还做不到。你们在农村的想进城，希望我帮忙。不错，我是国家主席，硬着头皮给你们办这些事，也不是办不成。可是不行啊！我是国家主席不假，但我是共产党员，不能随便行使自己的职权，你们现在吃饱了、穿暖了，就该好好为国家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少奇同志还说：“现在生活比

过去好多了，可是国家还不富裕，还有许多困难。我们大家都要好好工作，建设好这个国家，不能因为你们是国家主席的亲戚，就可以搞特殊，就可以不好好工作，随随便便。要为国家争气。”

在这之前，也曾有过一些熟人想靠少奇同志的关系找工作。确实，在有些人看来，帮助安排个合适的工作，这是他一句话的事。然而，少奇同志就是不说这一句话。他说：“这样不好，我们不能乱用党和人民给的权力，不能搞特殊。”

对于一个侄女要表的问题，少奇同志说：“你要一块表，我不是舍不得，也不是给不起，不是这样一个问题，我给你一块表，也不能代替你革命，古人说‘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要继续革命嘛！我们有了权不能乱用，为自己谋利益。”

当时，上海牌手表刚生产出来，曾作价60元送来给少奇同志。只要少奇同志说一句话，侄女的表就解决了，但少奇同志没有这样做。

少奇同志在会上说的话，虽然语气和缓，但观点明确，态度坚决，使到会的人受到了深刻教育。大家心悦诚服，纷纷发言，表示拥护少奇同志的意见。从那以后，请求少奇同志办私事的人就少了。

少奇同志对子女的教育是多方面的，尽管工作很忙，但他从不放过任何能够使孩子得到锻炼的机会。他教育孩子的方法是“管”、“放”结合。

1965年夏天，王光美同志在河北新城县高镇搞四清。有一天，少奇同志把一位秘书叫去，说：“我写了封信，让平平给她妈妈送去，你们不要给她买车票，不要送她上车站，更不要用小车送她。也不要通知光美同志或县委去车站接她，让她自己买票，自己上车。”

当时，平平刚15岁，还是个孩子，过去没有出过远门。听了少奇同志的话，秘书心里不免有些嘀咕，为避免孩子路上出差错，想谈点意见，可是少奇同志接着说：“小孩子不能什么事总靠大人，要让她自己闻闻，才能得到锻炼。总靠大人帮助，她倒是舒服省心，可是得不到锻炼，将来还是不会做事情。”

少奇同志看事情，总是站得高，看得远，在孩子的培养教育上也是这样。

少奇同志接着又说：“对小孩子，一是要管；二是要放。什么叫管，管什么？不好好学习，品德不好，要管；没有礼貌也要管。你们自己的小孩子不是也要管吗？我的也一样。当然管也要得法，不要束缚他们的手脚。”

说到管孩子，使我们想起1959年的一件事。那时候，平平和源源在实验二小读书。有一天，少奇同志把他们的老师请来，讲了管孩子的事，少奇同志对老师说：“你们要把我的孩子当作你们自己的孩子那样管，不要迁就他们，不要因为是我的孩

子就可以照顾，相反，应当对他们更严格地要求。”

对孩子的严加管教，这是少奇同志一贯的思想。那些年，为了配合学校教育孩子，每次开家长会，只要没有特殊情况，王光美同志总是根据少奇同志的意思，骑自行车亲自到学校去参加。

什么叫“放”呢？少奇同志说：“吃苦耐劳的事情，经风雨见世面的事情，要放手让孩子去干。这样可能要跌些跤子，受些挫折，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得到锻炼。”

由于家庭教育严格，少奇同志的孩子都很俭朴，有毅力，有志向，有骨气，从小就学习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少表现出什么优越感。平常他们在外面从来不提自己是谁的孩子，叫我们某某秘书时，还总要加上“叔叔”两字。我们不让他们去的地方他们不去，不准他们接触的东西，他们自觉躲得远远的。

那一次，平平自己从北京中南海到河北新城县。当她突然出现在妈妈面前的时候，在场的人们都很惊奇，抢着问：“平平怎么来的呀？”“谁送你来的呀？”平平高兴地回答说：“我自己来的，谁也没送。我知道怎么买票了，知道怎么上公共汽车、怎么坐火车了。”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少奇同志的严格要求，对孩子们后来的健康成长，产生了很大作用。“文化大革命”中，孩子们被迫离开了父母，独立生活，曾受到一些人的歧视，但他们没有采取“破罐子破摔”的消极态度，而是迎着风雨，接受考验。像平平，“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才中学文化程度。那些年一直在济南一个马场劳动，业余坚持学习外语，现在已成了专业翻译。“文化大革命”时潇潇才6岁，后来，她不管别人怎样歧视。自己坚持读书，取得了优异成绩，粉碎“四人帮”后，考上了大学。源源插队8年，亭亭工作9年，由于坚持自学，也都考上了大学。孩子们在与父母隔绝的情况下，都能够独立生活。经受住了各种磨难挫折，并且在学习、工作中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这与少奇同志生前耐心、细致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十一、彭德怀住在永福堂

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东南角，有一座中国古建筑，这座建筑叫“永福堂”。1953年，彭德怀从朝鲜回来后，就住在这里。

这座院落，有北房5间，西头的两间打通了隔墙，是彭德怀的办公室和会客室。东头的两间是卧室兼作他夫人浦安修工作和学习的地方。当中的一间，由东到西打了一个隔断，隔出十来平方米的一块空间，作为餐室。东厢房作会议室，有时用来

召开军委办公会议，后改为宿舍；西厢房是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和宿舍。

永福堂这座房子，由于长年日晒雨淋，门窗和廊柱的油漆剥落，斑斑点点，很不好看。而办公室天棚的一角还漏雨，每逢下雨总要湿一大片。彭德怀住进来以后，管理部门几次请示彭德怀，对房屋进行翻修和粉刷，但彭德怀不同意，只同意哪里漏就补哪里，能住就行。并对工作人员说：“要时时想着国家这个大家，眼睛不要盯着我这个小家，能节约一些就节约一些，把节约下来的钱用在国家经济建设上！”1956年，管理部门对房屋进行检查后，发现彭总住的永福堂破损十分严重，于是便拟出了维修计划，送到彭总办公室，请彭总批示。

彭总一见是维修永福堂的请示件，就有些不高兴，对工作人员说：“房子是住人的，不是图好看的！门窗、廊柱的油漆脱落并不影响居住嘛！”

彭总身边的工作人员将彭总的意见转告了修缮队，修缮队的领导说，油漆门窗和廊柱不仅仅是为了好看，更主要的是为了防腐蚀，延长使用寿命，这完全符合彭总厉行节约的精神，如果到廊柱彻底破损再修缮，那花钱更多。为此，修缮队同志要求工作人员再次向彭总请示。

一天晚上，彭德怀坐在走廊的藤椅上休息，机要秘书孟云增上前小声地对彭总说：“彭总，修缮队的同志说，房子的门窗、廊柱确实该油漆一下了！”

彭德怀听后，显得有些不高兴：“怎么又提这事，不是说过不修了吗！”

孟云增微笑着指着就近一根廊柱说：“您看，这根柱子因为油漆剥落，木头已经腐朽了，如果现在不修，以后就得换柱子，那花钱就更多了，那时，可是因小失大呀！”

彭德怀听后，站起来，走到那个廊柱跟前，看了看，又动手敲了敲，发现廊柱确实该油漆一下了，便勉强地说道：“你们这些人呐，理由就是多……”

永福堂的庭院不大，住房就显得紧张。彭德怀的侄子、侄女住校学习，节假日回来探望，晚上必须赶回学校，因为永福堂没有房间留他们在这过夜。小侄女彭钢改为走读后，不得不把东厢房的会议室，从北头隔出一小间来给她住，尽管很不方便，但总算有了一个安身之处。后来，左权的女儿左太北也来了，住房就更加紧张了。彭德怀和夫人浦安修很是发愁。

一天吃罢晚饭，彭德怀和夫人浦安修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寻找空地，转了好半天后，彭总走进孟云增的办公室，把他叫到院子里说：“太北的住房怎么解决？现在房子实在住不开，只有考虑盖一两间。”

孟云增非常熟悉永福堂这个院子，早在他来彭德怀这工作时，就将永福堂的院子仔仔细细地“侦察”了一番。所以，他听到彭总准备在院里盖房时，便建议道：“西厢房靠南头的院门处，有二十多平方米的空地，可以盖两间小平房。”

彭德怀点了点头，表示同意，由孟云增出面和有关部门商量。经过精打细算，需材料费一千多元。

彭德怀一听，忙问孟云增：“一千元，能买多少斤小米？”

“能买一万斤。”孟云增如实地回答说。

“一万斤小米，这要多少农民的劳动，又能养活多少人？不盖了！”

彭德怀在日常生活中，习惯用小米作为计算单位。每当遇到花钱的事，他总是首先想到抵多少斤小米，想到农民“汗滴禾下土”，种出一点粮食来之不易，花钱不能大手大脚。就这样，盖房子的事，就告吹了。

房子不盖，住房的困难不能解决。可巧，几天之后，彭德怀出院散步，到附近东八所，看见那儿正在拆旧房。彭德怀赶紧回到永福堂，和孟云增说：“你去找他们商量一下，咱们能不能用些拆下的砖头和木料？用那些旧材料，不是可以省些钱吗？”

孟云增和修缮队的同志商量，他们答应可以用。孟云增高兴地向彭德怀汇报说：“盖房的材料可以解决了！”

彭德怀听后，点了点头没有吭声，站起身，走到庭院转了一圈，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房子一盖，就把路堵上了，朱老总散步从哪里走？”原来朱德到中南海散步，习惯于从彭总家的院门穿过，房子盖起来后，朱德只有绕行。

彭德怀觉得此事不妥，摇着头说：“不能那么做，朱总走这条路惯了，不能改变他的习惯。只能改变主意，房子暂且不盖，等以后再说。”

后来，大家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只有在西厢房南头盖好，为了使朱德去中南海散步时不绕路，还从这院子里经过，要在西厢房的北头再开个门。彭德怀同意了这个办法。就这样，几经周折，最后盖起了总共只有20多平方米的、比老房子矮半截的两间小平房。

彭德怀一向生活俭朴，他在永福堂居住期间，没有单独开伙，一直和刘少奇、朱德、杨尚昆等领导人在一个食堂就餐。有时打饭回家吃，剩下点饭菜，还嘱咐工作人员给他留着，下顿热热再吃。他穿的衣服，经常缝补，很少买件新的。平时上班穿的是军常服，下班后换上中山装、便服和布鞋。只有参加外事活动时，才穿上礼服和皮鞋，回来后马上脱下来保存好，为的是延长服装使用寿命，为公

家节约开支。

十二、庆云堂内的住户

在中南海庆云堂居住着李富春、陈毅、邓小平等领导同志。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有许许多多的光辉典范值得我们年轻的一代学习。而他们伟大的风范，是难以用三言两语而写得完的，我们只好采撷他们生活的一个侧面，来记叙一下他们的伟大与平凡。

一位李富春的机要秘书介绍说：我来自豫中平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但我有幸跨进中南海，成为一名机要秘书，在中南海接触了许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第一次送文件到李富春副总理家，便和副总理话起了家常。

那是一天下午，总值班室打来电话，说李富春同志要看财政部送来的紧急报告，要我马上把文件送到他家里。

我赶忙来到庆云堂。一进大门，见正房门前的葡萄架下，有两位老人坐在藤椅上各自看着当天的报纸。因为前几日在湖边见到李富春副总理和蔡畅同志，所以一进门就认出他们了。

按照工作制度，我们是把文件直接交给秘书的。但由于第一次来李富春家，不知秘书住在哪个房间，且又不好打扰李富春副总理，情急之中，便将脚步放重，故意弄出声响。

蔡畅同志听到脚步声后，抬起头，像我们在湖边相遇时一样，她笑容可掬地说：“机要室送文件的同志来啦！”

“首长好，我是来送财政部急件的！”

李富春副总理听到后，忙放下手中的报纸，转过身对我说：“你辛苦了，请坐一会儿。”

“谢谢首长，我要把文件交给秘书。”我很拘谨地说。

“哟，秘书今天不在，把文件交给我吧！”李富春副总理说。

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首长的秘书如果不在，首长夫人只要不是党外人士，可以让首长夫人代收文件。于是，我便恭恭敬敬地把文件包送到了蔡大姐手里。

蔡大姐取出文件，递给富春同志。富春同志接过文件，在文件的清单上签了字。

我收好文件包，正准备告辞，富春同志说：“坐一坐再走嘛！我怎么不认识你？”

“我是才调来不久的新同志。”

“从什么地方调来的？”

“河南。”

“河南郑州现在变化可大啦！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在郑州，那时郑州站可不是今天的样子。那时还是用席子搭的棚子呢。你是郑州人吗？”

“我不是，我是漯河的。”

“漯河是个小城市，但历史却很悠久了。漯河北边有一个小商桥，当年杨再兴抗金阵亡在小商河里。如今还有他的墓地呢！北伐时期，贺师曾在那一带打过仗。解放前，小小的漯河市都有美国人办的医院呢！”

“是的，我参观过杨再兴的墓地。我们漯河市还有一条天主教堂街，说是街上的天主教堂也是美国人办的。”

“是的，你们家乡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来北京工作想不想家？”

“不想家。”

“不想家？不是吧？想家是会想的。刚刚参加工作，是要有个想家的过程，时间长了，就好啦！”

“结婚了没有？”

“没有。”

“他们现在提倡晚婚！晚婚光荣。这么大年龄怎么能结婚。”蔡畅说。

因为蔡畅大姐知道我是才调来的，便告诉我，后边几个院子住的是谭震林、邓小平和陈毅同志……

送文件回来的路上，我心里充满了快慰。富春同志和蔡畅大姐是这样的平易近人，这样的和蔼可亲。我这个进城不久的土包子，居然感觉不到他们身上的“大官”的威严。每当回想起他们的亲切谈笑如话家常，心头便升起无限的温暖。

在庆云堂，陈毅的住宅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在庭院中茁壮地生长着5棵他与张茜同志亲植的青松。他的住宅由五间正房和东西厢房组成，正房两间是卧室，两间是客厅，一间是书房兼办公室，写字台旁特制的超大号地球仪告诉人们他外交部长的特殊身份。

在陈毅的书房里，秘书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陈毅伏案工作，处理文电报告，有时遇到没有把握决定的事，便偷偷点上一支烟（最好别让张茜看见），静静地思考一番。往往是想着想着，站起身把公文包一合，往胳膊下面一夹，说声：“走，请示总理去！”便径直奔总理家去了。

陈毅敬总理如兄长，如良师，感情十分深笃。他们共同追求理想、献身事业的友谊，一直可追溯到青年学生时代。据说留学法国时，这两位思想激进、才华出众的年轻人就相识了。从那以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两人身负重任，时别时聚，又有过多少回令人难忘的重逢和交谈啊！虽然如此，陈毅对总理绝没有因亲密而不严格遵守请示汇报制度，相

反，有总理作为直接的领导和对外交工作具体掌握，陈毅觉得是一种幸福。

论秉性气质，这两人是不同的。总理严谨、细致、体贴，是个“当家人”；陈毅豪放、洒脱、热情，更像个“行吟诗人”。他们的外交风格各有所长，相得益彰。这两个同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奉献出毕生精力的革命者，如今在风云际会的国际政治斗争中，密切合作，和谐相处，将毛主席的思想，中央的方针，体现、发挥到了完美和光辉的程度。

中南海庆云堂C号院居住着总书记邓小平。这个院子正门朝南，门外有一条4米左右的东西向通道。但向西是个不能通行的半截子胡同，通道的东口又有一个角门。角门的设立使这个通道成了C号院的前小空院。出了正门，左转弯东行再出角门，便到了与怀仁堂大院一路之隔的南北通道。由于这个通道往来的车辆较多，警卫、安全保卫部门为尽量减少过往人员，规定一般工勤人员除特许的情况外，平时不许在此通行。

邓小平居住的这个院子内，有三栋房子，正房和东西配房。正房明三暗五的结构。院子虽然不太大，但显得豁亮、整洁、幽静。邓小平住在正房，东西厢房是工勤人员住的。

邓小平的家原来不在这里。以前他家住在吉安所右巷。那儿是独门独户的小楼房，条件比这里强得多。但因房租高，他家人口多，经济开销太大，他不愿为生活问题接受组织上的照顾，所以就搬到了中南海庆云堂。

小平同志对自己要求很严，平时很少说话。对夫人和孩子也要求很严。而且反对夫人参政，反对家中成员干预他的工作和看他们不该看的文件。他的组织观念、保密观念都很强，党内的机密连他的夫人卓琳同志也不让过目。

的确，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小平同志正是以他非凡的领导才能和耿直刚毅的性格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克己奉公、严以律己的思想品质，在人民群众中赢得了信任和爱戴。

十三、廖公避居中南海

廖承志是个乐天派，人人皆知。他乐观、豁达、开朗，有人说他是面对死神也会发笑的人。

“文化大革命”时，“火烧廖承志”、“炮轰廖承志”、“油炸廖承志”的大标语一夜之间贴满了大街小巷。

廖承志见到这些标语后，哈哈大笑：“火烧不好，那太疼了！”“炮轰，这招可以，一下子就去见阎王了！”“油炸不好，那太惨了点！”

尽管他无畏江青的兴风作浪，尽管他天生的快乐派，但处于当时的形势，他很快就要大难临头了。

在廖承志和其他一些老同志危难之时，周总理发出一道命令。廖承志等人被召进中南海接受“文化大革命”政策教育，提高思想认识，没有总理命令，不得走出中南海。

中南海北门右手有一排平房，廖承志、王震、余秋里、谷牧、陈正人等便避居在这里。

中南海墙外一圈都是“揪×、斗×联络站”，墙外要揪斗他们的口号声，清晰而响亮，只要他们踏出宫墙半步，立时如同羊入虎口。

在他们之间，王震也是个乐天派，他早年做过铁路工人，会做饭炒菜，对南味辣子鸡和宫保肉丁尤其做得好，真可谓色香味形俱全。在这里避居必须“自食其力”，自己管理自己生活。既然王震会做菜，那自然就成了掌勺的厨师。每当王震掌勺，廖公肩上肯定要搭条毛巾，和饭馆跑堂的一样，一边吆喝着，一边当下手，那举止，那动作，那幽默的话语，乐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

有一次，余秋里偷偷跑回家，从家里拿来一些包好的生饺子。别看廖公出国留洋，走南闯北，见过不少的世面，可下饺子这一招可从来没见过，也没有学过。既然不会，就叫别人来吧，可廖公天生好兴致，他见余秋里拿来了饺子，便主动抢活，要来煮饺子。

廖公进了厨房，在锅里放了一些冷水，同时也将饺子倒进锅了。然后锅下点火：不想等水烧开，一锅饺子成了一锅糊涂，真是片汤不像片汤、浆糊不像浆糊。廖公盛出一碗，再看了看这碗中的“饺子”，沉默有顷，好像在悟“道”。突然，他哈哈一笑，制出了一个新的歇后语：冷水下饺子——糊涂。

他们避居在这里，他们的夫人自然放心不下，经常要到这儿来看看他们，料理一下他们的生活。每当廖承志的夫人经普椿来，廖公总是如学生般听夫人的指示，他嘴里不住地说：“阿普，这个我记住了！谢谢你，阿普！”

有一天，廖公双手举着被烧了一个大窟窿的被子迎接夫人经普椿。

“阿普，有人放火啊！”他满脸严肃，一本正经。经普椿一听，猛地怔了一下，又赶忙看了看被子，急切地问道：“中南海里有人放火？凶手抓到没有？”

“抓到了！”

“谁？”

“我呗！哈哈哈！”廖公爽朗地笑起来。

“又开玩笑！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避居的生活使廖公感到很苦恼，没有工作，与世隔离，无聊得很。一向快乐的廖公也有了一

烦恼，于是便抽闷烟。晚上睡觉前，他总是一根接一根地抽个不停。这天晚上，他到后半夜才入睡。睡了不大一会儿，突然有人将门踢开，他猛地惊醒，以为是造反派冲进了中南海，要揪斗他们。可就在他醒的这瞬间，一盆盆冷水向他泼来。

原来他睡着了，烟蒂落在被子上，到后半夜着了火，满屋浓烟，幸好有个换岗的战士经过这里，发现了情况报了警。

廖公从被窝里出来，水珠滴答地往下淌，他打个冷战说：“这可成了落汤鸡了，看来火烧廖承志的愿望实现了。”

廖公拿起被烧成大窟窿的被子，眼睛一转，来了主意，明天夫人来，我就说有人放火！他想到这，又是哈哈一阵大笑。

经普椿从廖公手里接过被子，说明天拿个新的来。

廖公听后赶忙说：“那就麻烦夫人了！”“不过还有一件事，必须告诉你。”

接着，廖公又告诉经普椿一件趣事：“有一天晚上，我睡得正香，突然觉得身子底下湿漉漉的，是尿床了？不会呀。从小就不爱尿床，怎么现在这么大了反而尿床呢？可用手一摸，确实是水汪汪热乎乎的。打开灯一看：嗨呀！原来是热水袋破了，发了水灾啦！”

廖公的幽默风趣是无处不在的，他妙语连珠常常把妻子、家人、同事逗得前仰后合，似乎他永远是快乐的。

十四、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南海

1959~1962年，是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

面对工农业生产跌入谷底导致的生活资料匮乏和饥饿的严酷现实，最难过的莫过于为了以最快的速度使国家强盛富庶而发出大跃进号召的毛泽东本人了。他对全体工作人员宣布：“我们要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毛泽东当年在延安的一句口号“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再度被刷写到了墙上。

中央人民政府将每个国民的口粮定量减到最低限度。低标准，瓜菜代。中共中央紧急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带头，国家干部带头，首先是领袖们带头勒紧裤腰带，渡过难关。

中南海里，机关干部们开始重新定量，先由个人报数再由群众公议评定。身高体阔的毛泽东，自报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6斤。刘少奇报得最低，只有18斤。周恩来报了24斤。朱德和毛泽东一样，也是26斤。

这一情况传到各单位党支部和党小组后，大家都认为领袖们自报的定量偏低了，起码应该和绝大多数男性干部们一样，定在28斤。但是领袖们都坚持说够了，已经写过，不要变动了。就这样开始按照他们报的数量发给他们粮票。

在领袖们的带动下，整个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勒紧了裤带，每人都把自己的粮食定量降了下来。定量是压缩了，可饥饿感和营养不良的现象，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为了在粮食定量减少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加一些营养，食堂的大师傅们和干部们想了一些办法，这就是采集一切可食的植物，和粮食掺和在一起吃。

一开始是采集自然生长的植物，像挖野菜、捋榆钱儿等。中南海里，特别是沿着中南海的外墙，种植了不少榆树。榆树的籽形状有点像古钱，俗称“榆钱儿”。采摘来后，大师傅们就把嫩榆钱儿和在面里，使蒸出的馒头个大一些，同是二两面的馒头，却能在胃里多占一点空间。

自然生长的东西很快就被吃光了。于是人们就种植一些野菜，比较普遍的是一种俗称“扫帚菜”的植物。这种野菜枝蔓多而密，把叶子撸净后，一株就是一把天然的扫帚，其俗称大概就是这么来的。这种野菜特别好生长，路边或犄角旮旯，再贫瘠的地方也能长得很茂盛。扫帚菜叶和玉米面或白面，放在笼屉里蒸熟了也不难吃。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除了寄宿在学校或在学校定餐的孩子还在学校吃饭外，原先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孩子，大多在家长的命令下，到大灶食堂和机关干部、工作人员们一起吃饭。像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家中的孩子，都是如此。

特别是朱德，不仅是把孙辈们都赶去了大灶食堂，还提出要求：“不准老买好菜，不准超过大多数人的饮食标准，不准超过自己的定量。”

这些家庭中的父母享受着党内高级干部的待遇，有一定的营养补助。但是他们从培养锻炼孩子出发，从不让他们享受不该享受的待遇，总是让孩子在大灶食堂进餐。当然有时星期天例外，因为多数成了家的干部，星期天都自家开伙。

在三年困难时期，李讷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和学校里所有的学生一样，她也重新申报了粮食的定量。回家时，毛泽东向她问起学校的情况，她告诉父亲，由于自己是共青团员，应该多为国家分担困难，所以申报时把定量压到21斤。

毛泽东听女儿这样说，感到很欣慰，同时也露出一丝忧虑，毕竟女儿还是在长身体的年纪。李讷接着说：“学校考虑我们正处成长发育期，将学生的定量统一定为27斤。”

“这我就放心了，这个定量基本能保证学生的营养了。”她感觉到父亲好像松了一口气。但父亲随即又说：“井冈山时期，打仗的战士还吃不上这个定量。”她明白父亲的心思，想想前輩度过的更艰苦的岁月，眼前的难关就能挺过去了。

困难的日子并没有很快过去，而且仿佛在加重。一次有个卫士到北大看李讷。李讷告诉他，在学校里吃不饱，又没有油水，老觉得饿得慌。卫士回到中南海，把情况反映给李银桥，李银桥自作主张，让卫士悄悄给李讷送去了一包饼干。

几天后，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他批评李银桥：“三令五申不要搞特殊化，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

李银桥辩解说：“别人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毛泽东火了，拍着桌子说：“别人我不管，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

见毛泽东如此较真儿，谁也不敢再违规。李讷从此一点儿接济也得到了。由于营养不良，李讷消瘦了许多。

一个星期天，李讷回到家里，毛泽东破例让她在家里和自己一起吃了顿饭。进中南海以后，毛泽东的所有子女，就一直按照父亲的旨意在大食堂吃饭。

此时正是毛泽东宣布了“三不规定”之际，家里的饭莱也没太大的油水。可饿了一星期的李讷，看见桌子上三四盘炒菜、一碗汤，外带辣子、雪豆腐等小碟，胃口一下就被吊起来了。她没等父亲下“吃饭”的命令，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舌头被烫得“咝咝”直吹。“慢点吃，别着急。”女儿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毛泽东都看在眼里，但话音依然平静。

在学校吃饭都很快，习惯了，李讷并没有想到掩饰。她一边说一边不停地扒饭，她第一个吃完了自己碗里的饭。她端着空碗眼睛却忍不住瞟向桌上的剩菜。

李讷从来就不是个贪吃的孩子，如今这副模样意味着什么？明察秋毫的毛泽东心里很清楚。他停住了筷子，江青也怔了一下，继而把自己碗里的饭拨到女儿的碗里。

“哎，你们怎么不吃了？”生活上粗线条惯了的李讷诧异地问道，“妈妈，你怎么吃得这么少？”这几天胃不舒服，老泛酸水，不敢多吃。”江青说着又用手揉着心口。过了一会儿，她低头离开了饭桌。

毛泽东拿起了报纸，一边看一边说：“我年轻时在湖南搞农村社会调查，有次饿了一天，讨到一碗米饭……”李讷吃得正香，没搭父亲的话：“你们不吃我就全打扫了啊。”

“唔，打扫干净。三光政策，不要浪费。”说完，

毛泽东又把目光从女儿身上移开，转向报纸，直到李讷把桌上的盘子都拾掇干净。

目睹了这一情景的卫士，心里很不落忍。事后向毛泽东进言：“主席，李讷太苦了，我想……”没等他说完，毛泽东就打断了他：“和全国人民比较来说，她还算好一些的呢！”可是……“不要说了。我心里并不好受，她妈妈也不好受。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能享受的就不能享受。”毛泽东叹了口气说，“还是各守本分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

在困难时期，毛泽东曾有过一星期不吃米饭、7个月不吃肉、不喝茶的记录。周恩来过意不去，关切地劝毛泽东吃一点肉，因为几位领袖都跟着毛泽东不吃肉了。但是毛泽东的一句“你吃了吗”的反问，就把周恩来的口给堵上了。

为了使毛泽东增加营养，中南海里负责为首长服务的部门领导费尽了心思。肉、蛋这些东西毛泽东绝对不碰，但是他不拒绝野食。偶尔弄两只麻雀，在中南海捞点寸把长的小鱼虾，还是能劝他吃一点的。于是他们就打几只麻雀或掏两个麻雀窝，或者用筐捞些小虾。但这只能间隔一段时间搞一次，也不能一次量太大。否则，主席同样不吃。

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曾过了三个生日。从现在保存下来的菜谱看，这三个生日都过得相当简单，与平时没有多少区别。三个生日宴上，没有酒，没有寿糕，也看不出丝毫喜庆氛围。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69岁生日，他只吃了早餐，晚上仅吃了一碗麦片粥。早餐时，毛泽东请了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吃，菜谱上记载着这样几道菜：“干烧冬笋、油爆虾、白汁鲤白鱼、鸡油冬瓜球、炒生菜。”

开创新中国的伟人，在三年困难时期，与民共苦，这是许多外人不可想象的，但事实确是如此。

60年代困难时期，刘少奇的几个子女还都很小，但他们都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坚持在学校住宿吃饭，和别的孩子一样同甘共苦。当时许多人劝刘少奇和王光美把孩子接回家吃住、生活，可以比学校过得好一些，但刘少奇坚决不同意。他说：“国家主席的孩子应该和工农群众的孩子一样，不能搞特殊。群众吃不饱，我们有责任。让孩子们尝尝吃不饱的滋味，有好处，等到他们将来为人民办事的时候，会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再不要让人民吃不饱饭了。”

有一次，北京第二实验小学食堂发给每个学生的午餐是几块白薯干，黑糊糊的还有些发了霉。刘源咬了一口味道很不好，就给扔了。这事发生在临近星期六放假那天，所以一回家，刘源就把这件事对父亲刘少奇讲了。当时刘源认为学校这样做不对，怎么能把发霉的东西给学生吃呢？所以讲的时候理直气壮。

然而他没想到，刘少奇听了后，语调沉缓地告诉他：目前整个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怎么说你们还有吃的，偶尔才吃上这么一点不好吃的东西。你要知道还有许多群众连这样的东西都吃不上呢。你们还没有尝过吃不饱的滋味。你们应该尝尝群众吃不饱的滋味，那样才会有和群众同样的感受，才会有人民的观念。将来你们为人民办事的时候，也才会和人民站在一边。

听了父亲的话，原来想得很简单的刘源好像一下子领悟了许多，并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当时没有谁要求他怎样，但他一回到学校，马上找回自己扔掉的白薯干，冲洗干净，吃了下去。

给自己定量缩减到26斤的朱德，对如何渡过困难时期，似乎胸有成竹。朱老总有长期坚持在房前屋后开荒种瓜、豆、蔬菜的习惯。而且即便在没有饥荒的时候，康克清也常陪老总外出，剥点野菜让家人尝尝鲜。用瓜豆蔬菜、野菜同粮食掺和着吃，对朱老总家里的人来说早已习惯了。

困难时期，朱德和康克清带领身边的干部和孙辈们，开了更多的荒地，又加种了一些杂粮。还鼓励孙辈们自己挖洞，饲养了一些兔子。朱老总依靠自家的力量解决了粮菜不足的问题。除了自家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外，朱德像以往一样，还将一部分送给大灶食堂。

朱老总家在房前屋后开荒种植蔬菜杂粮的做法，不久就在中南海普及开来。许多院落房前房后的空地，被开垦了出来，种上了向日葵、玉米、南瓜、土豆……一时间中南海内的房前屋后到处都生长着高高低低重重叠叠的农作物，这反而为中南海增添了几分绿意。

地开出来，种子撒上后，人们便又操心如何积肥、改良土质的问题，以使农作物长得更茁壮，结出更多的果实。当年为了积肥，家住中南海的孩子们还做出过一些很可笑的事情。

当年大人们在秋后，把干树叶和干杂草什么的，烧成草木灰，当作肥料撒在开出的地里。孩子们就以为凡是可燃烧的东西，烧完的灰都可以做肥料。于是就在中南海里到处搜罗可燃烧的东西，堆在他们自己开出的荒地边上烧。

一天，几个父母在政治秘书室工作的孩子，在拆了的旧房子瓦砾堆里，抽出了一些油毛毡，把它和干树枝叶放在一起烧，以为找到好肥料了。油毛毡燃着后，冒出滚滚的黑烟惊动了中南海里的警卫人员，以为着火了。

警卫人员跑来扑灭了火，并通知其家长。说他们的孩子在放火。孩子们的家长随即都赶来，当问明了原因后，都有点哭笑不得。

当时每个家庭除了在自家门口开一小片荒外，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还在1960年春天，在北

京郊区的西山附近，建立了一个农副产品生产基地。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轮流去那里参加劳动，每人每年去一个月。去劳动的人，每天补助一斤粮食。

干部们在生产基地里，种植了玉米、大豆、瓜菜等作物，还饲养了数十头肥猪和一二百只羊。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一年下来即见成效。生产基地农作物的丰收，使机关食堂里的伙食有了改观。同时干部们还感到，经过这种锻炼，在感情上和群众更接近了。这个农副业生产基地因此坚持办了下来，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被划归到附近的人民公社。

为了渡过难关，什么办法都想了。中南海里一直养着鱼，专门有养鱼班的人负责打草喂鱼。以往是隔一段时间撒网捕一点，主要是给食堂，也卖一些，但次数很少，所以鱼长得挺大。由于多年的积累，在困难时期为了增加一点荤腥，打鱼的次数就多了一些。

还有一个关于鱼的故事。1961年春节前，青海省知道党中央机关生活艰苦，从青海湖打了2000多斤湟鱼，送到国务院，说是给周总理送鱼，并请周总理转送党中央。

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第一，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困难时期党中央应该和人民同甘共苦，不能接受这样的馈赠；第二，既然鱼已经送到北京再返回耽搁时间可能腐烂，就由北京二商局按市场价格收购，随即在市场上出售。中共中央机关和国务院一斤也没有留。

到了1961年，食物缺乏的情况好像比上一年更厉害。在北京第十三中学上学的邓朴方就感觉学生食堂的杂面馒头越吃越小。中学生正是能吃的时候，一个馒头咬几口就没有了。干的没了，大家就抢着喝稀的。一桌8个人能喝上盆棒子面粥，喝得肚子胀鼓鼓的。但毕竟是稀的，过一阵子肚子就又生出了饥饿感。

就在这时，邓朴方他们从报纸上看到某位大科学家提出“少活动，晒太阳”可以抵抗饥饿的介绍，继而又有人换算出晒多少时间相当于吃一个鸡蛋。他们便立即效法之，每天中午饭后就走到操场上，往沙坑里一躺，开始吃这种“太阳鸡蛋”。

在中南海里的机关里，大概也是受这种宣传的影响，在每日正午，也大啖“太阳鸡蛋”。

吴庆彤的女儿吴继平说：“困难时期星期天在家，就可以看见工字楼里的大人，中午都拿个小凳子出门，坐在太阳底下晒太阳，一边晒一边说话。看谁的腿浮肿了，互相按着，看谁的坑深复原得慢，就说明谁浮肿得厉害，然后就开始互相按摩。”她的父亲说：“孩子的妈妈因为把有点营养的东西都省给孩子了，自己因营养不良全身都浮肿了。我

好一点，是因为每个星期开国务会议时都要参加，就能跟着吃一顿大烩菜，能补充点营养。”

吴继平还记得她的两个哥哥，当时都是在长身体、放开肚子猛吃猛喝的年龄，在那个时候总是吃不饱。实在受不了了，就在家里乱翻，只要找着什么吃的，就吃个精光。结果老是因此打乱大人的计划，挨大人的打。

有一次，他们在家里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找到一个装满绿色液体的瓶子。他们尝了尝，那液体又甜又辣也不知是什么。两人开始还不敢多喝，后来实在饿得难耐，便把那液体喝光了。这下不得了，喝完后，他们都倒在了床上，直到晚上都没醒过来。原来那是一瓶青梅酒。

十五、毛泽东厨师的回忆

23岁的东林发做梦也没想到能担任毛泽东的厨师。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在中南海，在丰泽园，他与伟人毛泽东接触，他感受到了伟人的风范。每当谈到毛主席的生活习惯和细节，东林发沉静的表情即刻露出幸福的笑容。

多年之后，东林发敞开心扉，向人们讲述了他给毛主席当厨师的内情：

1960年，我在锦江饭店做厨师，当时我才23岁。

6月的一天，锦江小礼堂正在秘密召开一个中央会议，我们负责中央首长的饭菜。那天晚上，饭店副经理忽然把我叫到他十七楼的办公室，我去时心里很紧张，因我当时负责烧十七楼的饭菜和夜点心，以为自己出了什么政治问题，带着一身冷汗来到他办公室。想不到他对我说：“东林发，你明天乘专列去北京，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报到。”我一听傻了眼，当然，兴奋大于惊乍。我二话没说，跟别人借了一辆脚踏车，回家匆匆跟父母说了一下，只说是到北京出差，当时我妈妈已睡，我敲了一阵门才把她吵醒。她问我啥时回来？我说不晓得。那时候我们都住在锦江的集体宿舍里，即现在花园饭店的一座小楼，一般是不能回家的。

刚去这段时间，我被安排在中央警卫局的服务科大厨房烧菜，有时候首长请客才把我临时调到他们家去烧菜。原先我在锦江主要是烧粤菜的，不过川菜也会烧，到了中南海后，由于首长中四川人和湖南人多，所以我就以烧川菜为主了。

有一次，邓小平的厨师有事，服务科领导就让我到邓小平家去烧了4天菜，他们也挺满意的。

7月的一天，毛主席家请客。毛主席说：“吃来吃去就这几个菜，是不是今天弄几个新花样出来？”当时毛主席并不知道大厨房来了个上海厨

师，而服务科的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那天，我烧了两个特色菜，一个是冰糖肘子，一个是烙草(青)鱼。毛主席吃得很开心，吃完后他问侍卫：“今天的菜是谁烧的？肘子很好吃的嘛，鱼也很有特色。”

侍卫说：“是服务科调来的上海锦江饭店小厨师烧的。”毛主席笑了。

我从丰泽园出来时，毛主席把我叫住，与我照了张合影。

记得1960年的10月，北京已是寒冷的初冬了。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提出中央带头“以素代荤”。当时毛主席家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婿和江青。毛主席在家里作出一个规定：子女不允许在家吃，只能跟大家一样到大食堂去吃，只有周末，允许全家开一顿小灶。毛主席自己吃的也是“以素代荤”。当时北京没什么蔬菜，只有大白菜，毛主席的厨师在做蔬菜上也做不出什么花样来。

一天，服务科科长问我：“上海有什么北京没有的蔬菜？特别是可以根据北京的条件自己做的素菜？”

我说：“有的。如大力油面筋、烤麸、素鸡等，都是北京没有的。”

他又问：“你会做吗？”

我说：“可以做做。”

第二关，汪东兴（当时的中央警卫局局长兼一组组长）和服务科科长找我，让我到一组去烧菜。

那时的一组就是毛主席，二组是刘少奇，三组是周恩来，四组是朱德，五组是彭真，六组是邓小平，七组是林彪。就这样，我开始到毛主席家烧菜，做上海素菜，做油面筋、烤麸、素火腿、素鸡，做着做着，我就留在毛主席家了。原来的厨师调走了，我就成了毛主席的私人厨师，一做就做了5年，一直做到“文革”开始。

毛主席“以素代荤”一直吃到1961年底。给毛主席烧菜不太复杂，一天只做两顿。每天下午4点到5点起床吃午饭，晚上办公一直到凌晨2点，到5点才吃晚饭。午饭一般一个全荤、一个半荤素、一个素菜、一个汤。晚饭吃小米粥或绿豆粥加一小碗饭，一个全荤就是一二两红烧肉，一个半荤素即青椒炒肉丝等。毛主席半夜里吃的这一顿要格外当心，所有的菜都不能带骨头的，因为这时毛主席有点倦、有点累了，人也有点迷迷糊糊。我往往给毛主席弄一小碟或一小盆煸干的小辣椒、豆豉炒苦瓜、清炒空心菜梗子、咸菜，等等。毛主席的要求是，不能浪费。他叫我们（包括侍卫）不要到大食堂去吃，他说吃不了的边边角角的剩下的菜不要扔掉，让我们就在他家吃，而按理我们是要到大食堂去吃的。

毛主席特别喜欢吃红烧肉，我烧的时候重糖

重酱油，咸中带甜，每月烧两次，毛主席每次吃了都很开心，还笑着对我说：“吃了这东西补脑嘛。”毛主席还喜欢吃回锅肉，为了烧好这回锅肉，我在做法上动了不少脑筋。

这就要讲到 1959 年庐山会议，当时锦江去了一批厨师，我也在其中(那时我还没去北京)。会议期间，回锅肉烧了几十年的川菜泰斗杨平章，按川菜的规格，用猪腱肉烧回锅肉，这块肉是相当老的，当时毛主席咬不动，不喜欢吃。进京后，我就自己想办法改进，用五花肉切成片，在锅里将肥油煸掉，这样烧出来的回锅肉又香又嫩，毛主席说很好吃。

中南海里河虾很多，但捕捞网的网眼太大，往往捞不到。我就自己想办法，到特供区讨了只箩筐，箩筐里放些饲料和肉骨头，再压上一块砖头，将箩筐沉到河底。每天捞上来时箩筐里爬满了虾，我就给毛主席烧油爆虾，再送点给刘少奇。

我也有过不成功的地方，大概是 1964 年吧，我跟毛主席到井冈山，那里是烧木炭的，毛主席要吃烘山芋，这下我伤脑筋了。做烘山芋要不断烤，而木炭烧完了就没了，那里既没烤炉又没煤球。第一天我只能用木炭烤，结果没烤成，毛主席也没吃完。第二天，我找来医院的消毒箱烤，但温度不够，还是烤不好。我就把山芋先煮熟再放进消毒箱烤，也不行，水分收不干，再用木炭烤，这次成是成了，但毛主席说：“不香，这是什么烤红薯啊？”这些红薯是在北京的万寿山专门种的，毛主席出差总是随身带一些。

这事汪东兴后来批评我：“毛主席不满意，我们就一定要想法做好。”第三天，我用报纸把山芋包好，用烂糊泥糊好，再放在木炭里烤，搞好后毛主席又不吃了。接着，他就离开了井冈山。

我们厨房在丰泽园的后面，菜是由侍卫送进去的，与毛主席直接接触很少。

毛主席一年出差两次，我都跟着一起去。出差时，毛主席有个脾气，就是不许多花地方一分钱。需要地方上买菜的，买菜的钱是毛主席自己出的。他还有一个纪律，随同的工作人员不许搞特殊化，不许大吃大喝。

有一次，毛主席在上海，李银桥一人点了许多菜。毛主席发现后就狠狠地批评了他。我与毛主席接触最多的是在出差的火车上。在北京期间我是没有探亲机会的，快到上海时，毛主席对我说：“这次到上海后你回去看看父母，并代我问问你父母好。”后来汪东兴通知我回家，说我们到杭州去，你就不要去了，回家看看。

1965 年，有一天清早，我正在中南海捞虾，毛主席出来散步，刚巧碰到我，他便停下脚步，饶有兴致地看我是怎么捞虾的，看完他笑着对我说：

“你每天就是这样捞虾的啊？方法不错嘛！”接着又问我：“你有没有对象啊？”我说：“没有。”毛主席说：“在北京找一个对象好不好？”我说：“我父母在上海，将来哪一天主席你不要我了，我就回上海找老婆成家。”当时，我已二十八九岁了。

和毛主席谈后不到一周，汪东兴就来找我说：“主席说了，叫你回去，给你一年时间，在上海找个对象，成个家，业务上再继续学一学。”就这样，我就结束了在中南海的生涯，回到了上海。

毛泽东的厨师长王近仁的经历则更具传奇色彩。

1920 年，王近仁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为了谋生，他 12 岁那年就到长沙四海春饭馆当了学徒。由于学艺非常刻苦，他不到 16 岁便成了掌勺的大厨师。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他凭着手艺四处流浪谋生，直到全国解放后才回到故乡长沙。

一个偶然的机会，王近仁来到了首都北京。1953 年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一封信，是当年一起学徒的师兄写来的，说他在北京开了一家湘菜馆，生意兴隆，邀请王近仁去帮忙。

位于北京西单的曲园酒楼顾客盈门，生意非常红火。王近仁到那里不久，便公私合营了。在合营后的酒店里，他仍然积极工作，力求上进，很得经理的赏识。不久，他担任了酒楼的工会组长，西城区工会劳保委员。这一切都非常偶然，也很平常，却为他以后能成为毛主席的厨师打下了基础。

一次神秘的“组织分配”使他成了中南海的掌勺人。

前来迎接王近仁的是两位新搭档。一个姓李，湖南人；一个姓黄，安徽人，以做川菜见长。他随着两位师傅来到了他们即将共事的地方：一个不大的厨房，厨具不多。正对着门的墙上端端正正地挂着一幅毛主席像，另一面墙上醒目地挂着一只闹钟，钟下面装着一个电铃。

初来乍到，王近仁用探寻的目光观察着这里的一切：灶房不大。灶具也不多，不像酒楼，更不像饭店。两位师傅告诉他，他们的工作是给中央首长做饭。首长工作很忙，吃饭没有时间规律，有时一天吃一顿，有时一天要吃 5 餐，夜里加餐是常有的事。首长吃饭要靠墙上的电铃通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电铃一响，就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按要求将饭做好，15 分钟后由值班卫士来取。

“八宝饭”是毛主席最爱吃的主食。王近仁进中南海不久，头一回给毛主席做饭，食谱上开列的主食是“八宝饭”。可是，走进厨房一看，什锦果脯、红枣、花生米、莲子、糯米、白糖和猪油这些最基本的原料却没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下他为难

了，不得已向卫士长李银桥做了汇报。

“王师傅，毛主席要吃的八宝饭，可不是你要做的那种八宝饭。只要把大米、小米、玉米渣、绿豆、红豆、黄豆、蚕豆、饭豆合在一起煮熟就行了。当年，在长征路上常吃这种饭，毛主席他老人家吃出了感情。”

为了让毛主席这个“湖南老乡”能吃上家乡口味的菜，王近仁从供应站领来一只鸡，按照湘菜的烹调工艺，做了一道拿手的湘菜——“东安鸡”。没想到，“东安鸡”又被卫士原封不动地提回来了。原来，毛主席说“东安鸡”是地主老财们吃的，他要吃“长征鸡”。

这里的老师傅告诉王近仁：红军长征时，生活极度艰苦，鸡、鱼、肉难得一见，偶尔改善一下生活，不是缺油就是少盐。那时炖鸡，找不到合适的配菜，常常是土豆、萝卜、茄子一起下锅。后来，毛主席给这道菜取了个名字——“长征鸡”。

在毛主席的食谱中，由他亲自命名的还有一道菜叫“叶蛋白”。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毛主席得知不少百姓在吃树叶、吃草根。为了和全国人民一起共渡难关，毛主席通知食堂吃树叶。这的确难为了厨师。吃树叶会不会中毒？影响了毛主席的身体健康谁负得了责？不得已，王近仁从院里采来槐树叶，用绞肉机将叶子粉碎，放在水盆里浸泡，捞出挤干水分后和玉米面掺在一起蒸花卷、烤饼干。想不到他用槐树叶做成的饼干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许，并欣然给它取了名字叫“叶蛋白”。

毛主席爱吃红烧肉，而且要肥的。毛主席写文章习惯关起门来，白天黑夜连轴转，有时十天半月才出来。有一天，他又连续写了几天几夜，弄得疲惫不堪，即将结束时，便吩咐卫士长李银桥：“馋了，你想办法弄碗红烧肉来，要肥点，我要补补脑。”江青听见了，不许李银桥去买肥肉，而是做了腊肉和鱼。吃饭时，毛主席一看，没有他想吃的红烧肉，发了脾气，责问李银桥，李银桥不敢说明真相，只是流泪。江青看见毛主席发火了，赶紧躲进屋里。毛主席到厨房一问，得知是江青的安排，便拍着桌子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就是要吃肥肉。今后我吃饭不要她管，我吃我的，她吃她的，就这么办！”从此，毛主席和江青分餐，各吃各的菜。

王近仁回忆说，毛主席吃红烧肉是高兴了才吃，是通知了才做，没通知即使做了他也不会吃。大致有个规律，每当他做出一个重大决策，成功地开完一次大会，就会提出要吃红烧肉。毛主席说，吃一顿红烧肉就是打了一次大胜仗。一次，开完中央全会，毛主席高兴地对周总理说：“恩来，今天吃一顿红烧肉不过分吧！”周总理立即通知李银桥，给毛主席加了一碗红烧肉。

毛主席也有不吃肉的时候。1960~1962年，中

国连遭三年自然灾害，苏联又逼中国还债，猪、鱼等副食品运去苏联还债了。毛主席在中南海，自己宣布三年不吃肉，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他还在中南海内开了荒地，种了辣椒用以佐餐。

每顿吃三菜一汤，这是毛主席给自己定的原则。叶子龙见毛主席工作了一昼夜，自作主张通知食堂给毛主席加了一道菜，可毛主席原封不动地把那道加的菜退了回去。

毛主席经常爱吃的素菜有辣椒、扁豆、空心菜、菠菜、芹菜等，尤其是菠菜刚下来的那阵子，毛主席通知要每天吃一次。苦瓜炒肉丝、黄瓜炒肉丝、木耳炒肉片，也是毛主席饭桌上的常见菜。他吃菜喜欢油水大，又特别喜欢吃猪油。在饮食嗜好的问题上，保健医生拿他没办法，厨师们同样对他无可奈何。至于海参、鲍鱼、大对虾、燕窝、鱼翅、大熊掌，王近仁给毛主席当了6年厨师，从来没有机会同这些高档菜打交道。

毛主席就餐，只定原则，不定内容。每顿“三菜一汤”这是原则，具体做什么菜什么汤，由厨师根据毛主席的口味而定。一次，叶子龙送来一条加工好的熊腿，指示说要想办法让毛主席吃下去。第一次给毛主席送饭，王近仁切了薄薄的两片放在盛凉菜的小碟里，毛主席全吃了。第二次送饭，他多加了两片，退回来的又是空碟。看来毛主席爱吃。第三次他再追加两片。这一回，毛主席传下话来：“美味不可多得，好东西要多吃几顿啊！”

给毛主席当厨师，既紧张，又舒心。说紧张主要是因为毛主席生活没有规律，他老人家工作起来常常废寝忘食，吃饭从来没有一个准点，深更半夜吃饭是常有的事。值班厨师全天候服务，还要负责按铃叫醒毛主席的两个女儿起床，上学，一刻也不敢懈怠。电铃响了，就像军人接到命令一样，立即投入战斗，并且按规定15分钟必须结束这场战斗。如今，15分钟做好一顿并不复杂的饭菜，可以说已不是一个难题，可那个年代没有天然气，没有微波炉，没有电烤箱，两个烧煤的灶台常常有意捉弄人。有时煤火烧旺了却用不上，而有时要用火又一时上不来，做一顿饭下来，往往要急出一脑门子汗。

按理说，毛主席吃菜很简单，在规定的时间内能够完成，只是那个“八宝饭”让人提心吊胆。米好熟，可豆难煮，既不能烧糊，又不能夹生，那火候实在难以把握。米饭里出现了砂粒，菜里发现草和虫子，这都是“事故”，大会小会都要挨批评。有一次，朱德在米饭里吃出了砂子，风趣地对家里人说：“我每顿只吃二两米，不应该有砂子啊！”后来，警卫局的领导知道了，多次强调要引以为戒，反反复复给厨师们不知讲了多少次。在中南海掌勺工作不累，就是责任心大。不过，看见卫士提着空碗空

碟回来了，王近仁紧张的心就会舒展开来，为毛主席吃光了自己的饭菜，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中南海，除了给毛主席掌勺外，王近仁还先后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董必武、彭德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过饭菜。

据王近仁介绍，刘少奇吃饭很有规律，每隔8个小时吃一顿饭，通常情况下不提前也不推迟，并且最不能容忍的是浪费，吃剩的饭菜不许扔，下顿还接着吃。有一次，王近仁替班给刘少奇掌勺，用炸过油的猪油渣做了三个葱油饼，又香又脆。刘少奇和夫人各吃了一个，剩下两个退了回来，也没有吩咐怎么处理。负责送饭的卫士见了，认为扔掉可惜，就把它吃了。终于吃出“麻烦”来了。晚上开饭时，刘少奇特意吩咐把中午吃剩的那个葱油饼送来，卫士一时傻了眼，情急之中，恳请王近仁重新做了一个送去。在刘少奇的带领下，整个中南海没有一个扔剩饭剩菜的。

朱德吃饭更为简单，他吃瓜果从来不削皮，洗干净了囫囵吃。为了节约，他给炊事班提出要求，土豆、黄瓜、萝卜能带皮吃，不要去皮。芹菜叶子也要拌着吃。当时七角钱一斤的大虾，他都舍不得吃。他说：“我们又不是地主，吃那么好的东西干嘛子！”他每次进厨房，总要掀开垃圾桶，看一看桶内有没有不应该扔的东西。菜叶丢了，土豆削皮了，他就要提出批评。

1962年10月，王近仁离开了中南海。到北京马凯餐厅工作直至退休。

十六、客居中南海的外国元首

第一位住到中南海里的外国国家元首，是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

苏加诺于1956年9月30日至10月14日访华。

本来，对他的来访，已安排好下榻舒适的国宾馆，但是他对周恩来总理提出，他要住到中南海。周总理提醒他，中南海环境虽然优美，但是设备和其他条件却并不好，远赶不上国宾馆。

苏加诺却说，他并不需要生活上享受，只想跟毛泽东主席住在一起。

多少年来，中南海以绚丽的自然景色、悠久的历史古迹，尤其是它成为新中国最高决策人物的居住地和国务活动的重要场所而为世人瞩目。可是，对大多数来访的外宾来说，中南海是神秘的，令人仰慕、神往的。所以，苏加诺坦率地提出来想住进中南海，可见他殷切的希望。

周总理同毛主席商量后，欣然接受了他的要求。苏加诺喜出望外，觉得他同毛泽东住在一起是

很荣幸的。他同毛主席交谈时，毛主席说：“阁下来这里可要受苦了，这里谈不上有什么现代化设施，生活起来很不方便。”

苏加诺笑着回答：“您能忍受的，我也能忍受，我愿跟您同甘苦。”

当时，苏加诺下榻勤政殿。不过，他既然开了外国元首住进中南海的先例，便有了后继者，那就是伏罗希洛夫。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于1957年4月15日~5月6日和5月24日~26日两次访华，他也住进了中南海。在宴请伏罗希洛夫时，毛泽东曾亲昵地称他“伏老”。

机警的伏罗希洛夫当即问他：“在中国话中，‘伏老’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种尊称。中国人习惯在尊称年事已高的长者时，在对方姓氏后面，加上‘老’字。”毛泽东笑着回答他，“这样，阁下的大名伏罗希洛夫的第一个字‘伏’也就成了姓了。”

伏罗希洛夫高兴地说：“我很荣幸能听到您叫我‘伏老’，尽管我并不认为自己正经老了呢。”

毛泽东不禁哈哈大笑：“啊！伏老不服老！”后来，郭沫若在赋诗记述此事时，还把毛主席这句话写到了诗里。

伏老是一位很诙谐的人。

有一次他在瀛台漫步，听别人说过去光绪曾被软禁于此。他叹息说：“可惜我那时未来此。要不然就解放了他。”

第三位住到中南海的是越南主席胡志明，他住的时间还比较长。

毛主席接见外国贵宾，通常是在颐年堂或勤政殿进行。但是，这次竟在他的书房——菊香书屋会见胡志明主席。他们亲如家人，不拘礼节，毛泽东穿着拖鞋，胡志明穿着汗衫，就这样亲密地谈着话。

从勤政殿的一个小旁门进去，便是菊香书屋。这是一个不大的四合院。院的北房明三暗五，四梁八柱，毛主席的卧室和书房便在这个房子东间。他还有处大书房在东厢房。

在胡主席来之前。毛主席在书房等待客人到来。

这一天，毛主席同胡志明促膝谈心，谈了两三个钟头。

十七、“中南海保镖”的传奇故事

沿着石板铺成的小路向里，一座乳白色的小楼静静地面对着一块四四方方的操场，操场尽头，“苦练神功绝技，献身警卫事业”几个大字赫然入

目，更说明了这所军营的不同寻常。

这所奇伟清丽的军营，就是担负中外领导人随身警卫任务的北京卫戍区干部队所在地。

干部队三分队分队长李诚明，虽然是位军校毕业不久的小伙子，但提起这支部队的辉煌历史，他便滔滔不绝——

1948年2月，中共中央社会调查部按照严格的政审条件，挑选中央警备团、华北军政大学政治及参谋大队和部分地方工作者中政治可靠、身体素质好、作战英勇的年轻连、排干部及少数老战士共130余人，在河北平山县西黄泥村组建了一支便衣队，这便是我军干部队的前身。

1970年3月，这支部队在整编中取消了编制。随着国内外形势的需要，1976年，北京卫戍区某师抽调优秀连、排级干部，重新组建干部队。自此，我们这支英雄的队伍警卫中外高层领导，写下了不朽的篇章，并且缀连起一个个神奇的故事来——

故事一：西方某国国防部长副官的钱包突然丢了。

小李是1998年底开始担负外军国防部长、总参谋长等高级将领来华访问时警卫工作的。在两年多的外事勤务中，他以一流的素质、过硬的技能，万无一失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为中国军人争得了不少光彩。许多外国领导人称赞他是“神兵天将”。

外事任务是光荣而神圣的。由于任务需要，每次执勤，李诚明都穿着西装，外人很难看出他的真实身份。但在外宾面前，却代表着国家，代表着军队，代表着中国军人的形象。

2001年11月的一天，李诚明和战友受命在长城饭店担负西方某国国防部长访华的警卫任务。

从机场到饭店，部长的副官总是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打量他们，对他们心存疑虑。晚上，正在执勤的李诚明，隐约发现不远处墙角有一件东西，走近一看，是一个精致的钱包，里面有厚厚的一沓外币。他没有多想，立即将捡到的钱包交给饭店保卫部门。第二天一大早，部长副官就找到国防部外办的同志，说自己的钱包放在房间里丢了，并对警卫人员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

李诚明得知情况后，立即打电话找来饭店保卫部的同志，当钱包中的钱分文不差地回到副官手中时，副官连连道谢，并对自己的态度和言语做了道歉。他坦言：他知道中国还比较穷，想看看警卫们的素质。

李诚明用自己的行动把外国人弄了个大红脸。

故事二：较量。

一个炎热的夏日，一个欧洲国家军队代表团来华访问。随行的两名警卫人员，长得膀大腰圆，见到我方卫士，表现出一脸不屑，对我方做出的安排挑三拣四。凭经验，李诚明意识到了两国警卫人员或明或暗的较量要开始了。

当日晚上，外方代表团团长到健身房锻炼，李诚明与另一名队员也随之到来，只见外方一警卫走到杠铃前，不费劲地举了起来，然后不怀好意地指指李诚明。

李诚明心里清楚和他拼力肯定不是对手，但如果就此罢手，就等于认输，就给中国军人丢了脸。于是李诚明和队友耳语了几句，只见队友在原地一个漂亮的“后倒”，接着一个“鲤鱼打挺”，李诚明来了一个“腾空飞腿”接“旋风脚”，看得老外目瞪口呆，不自主地连喊OK。

临别时，他们竖起大拇指对李诚明说：“中国军人真棒！这是我们国家的军徽，留给您做个纪念。”

故事三：邓小平望着临危不惧的谭先诚会心地笑了。

李诚明说，他的故事在干部队太普通了，几乎每个队员每次任务时都能碰到。“我还是给你们讲讲战友们真正的传奇经历吧。”他说。

1974年4月，联合国第六届关于能源发展的特别会议隆重召开。受毛主席、周总理的委托，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副总理健步登上飞往联合国的飞机。他的身后，是高大魁梧的卫士、干部队队员谭先诚。保卫邓小平同志的绝对安全，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中国的风采——谭先诚意识到自己肩头的重任。

谭先诚的工作一丝不苟。作为一名优秀的卫士，从踏上飞机的那一刻，他的敏锐和仔细便每每体现出来。座位是否安全，饮食是否卫生，他检查了一遍又一遍。

按照日程安排，邓小平同志驱车前往唐人街，参观市容，看望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刚拐上通向唐人街的十字路口，交通指示灯亮了红灯，轿车还没有停稳，一个黑人猛地扑向了邓小平乘坐的专车。

“不好！”谭先诚从轿车中飞身而出，迎面扑向了来势凶猛的黑人，一个转身别臂，将黑人拖出了马路栅栏外面。当绿灯再次出现时，邓小平的专车已安全驶离。

平时不苟言笑的邓小平望着临危不惧的谭先诚，会心地笑了。

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个乞丐，为了得到一些小费，不惜铤而走险。这场有惊无险的搏斗，更增加

了卫士谭先诚的责任感。

4月10日，邓小平洪亮的声音响彻在联合国的上空，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做的世界形势分析激起了潮水般的掌声……坐在台下的谭先诚激动得落下了泪水。

故事四：江总书记好奇地问张玉凯：“你是如何知道徐帅意思的？”

卫士的生活并不都是惊险刺激的搏斗。

1989年8月，刚从外地考察回来的江泽民总书记风尘仆仆地来到徐向前元帅住地。

总书记很关心老帅的身体状况，他握住徐帅的手说：“我刚从外地回来，中办的同志告诉我您病了。您是咱们国家的开国元勋，您的健康是我们的财富，我们盼着您早日康复。”

徐帅紧紧拉着江泽民的手，许多话一下子涌到嘴边，可徐帅病情较重，已经失去语言表达能力，只是嗫嚅着，让在场的领导很着急。

卫士张玉凯走过来，对总书记说：“徐帅说，您现在工作很忙，不要老惦记着我。”

总书记好奇地问：“你是如何知道徐帅意思的？”

原来，张玉凯在徐帅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不仅悉心照顾老帅的生活，还处处留心老帅平时的习惯，利用他的口形、手势、眼神准确地表达出首长的语言。

江泽民听着张玉凯的“翻译”，高兴地笑了。

因为有张玉凯做“翻译”，江泽民与徐帅攀谈了许久。在以后的日子里，日理万机的江泽民总书记又先后两次来到医院看望徐帅，张玉凯一次次地扮演了翻译的角色，拉近了共和国两代领导人的距离。

故事五：为首长嚼糯米，为首长搬石铺路。

黄克诚的身体痊愈了，而刘长春的牙龈却肿得几天吃不下饭……卫士的生活环境并不都是奔驰轿车，高级饭店和异国风情，陪护年老体弱的老首长也是他们的一项重要任务。李诚明说，他们中间的许多卫士，都像儿女一样陪伴在老首长身边。

人常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可干部队员们都以胜似儿女的感情，对待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首长。他们日夜陪伴在病榻前，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忠诚，他们没有节假日、星期天；他们为首长喂饭喂药、擦澡翻身，连一个囫囵觉都难以保证。

刘长春在中纪委第二书记黄克诚身边一呆就是6年半。

1985年秋天，黄老腰部患了一片带状疱疹，医生开了一个特殊的处方：用嚼碎的糯米，并与唾液一起敷在患处。

队员刘长春说，我在首长身边工作多年，身体也很好，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糯米又硬又涩，他每天嚼四五两，一个疗程后，黄老的身体痊愈了，而刘长春的牙龈却肿得几天吃不下饭。

杨成武将军的随卫李文涛是个能干的小伙子。1993年6月底，杨将军到山西看望部队官兵。

当车行驶在五台山盘山公路上时，忽然下起倾盆大雨，再往前走，严重的山体滑坡在公路上形成了200米的路障。雨越下越大，山体越滑越多，多停留一分钟，首长就多一分危险。李文涛立即跳下车，脱掉鞋袜，搬石铺路。双脚被锋利的石头刺出了道道血口，可他全然不知。20分钟后，鲜血染红了铺通的山路，李文涛将将军背过滑坡地段，才感到疼痛难忍。著名作家权延赤目睹了这个场面，他浓墨重彩地写下一篇《山西行》，发表在《十月》杂志上。

故事六：出国门传授中国功夫。

“在干部队，展现我们素质的舞台很多，有些甚至在海外。”李诚明接着讲了队友南养龙的故事。

1993年4月，厄瓜多尔海军学院向我国国防部外事局求援，希望有一名武术过硬的中国军人漂洋过海传授技艺。外事局同志来到干部队，队员南养龙运足气功，削泥般一掌切碎了鹅卵石。在座的负责人当即决定：就是这位小伙子了。

一下飞机，南养龙受到厄瓜多尔人民的热情欢迎，厄海军司令员、海军总参谋长、高等学校校长、水兵学校校长纷纷前来观看这位中国军人精湛的武术表演。在美丽的厄瓜多尔，南养龙很快组织起一支表演队，并在学院开设了武术体育课。

南养龙的传奇武术被厄新闻媒体报道后，名声越来越大，许多人慕名而来。当地华侨商会举办服装展销会，重金聘请他卖门票做广告。南养龙说：“我是来传授武术的，对不起，我不能参与你的商务。”后来，又有一个组织以4000美金的报酬邀请他作一场武术表演，他犹豫了，大使馆的同志鼓励他：这是展示中国军人风采的机会，表演一场吧。南养龙的表演再次在岛国掀起高潮。这个组织将4000美元酬金送给南养龙，南养龙转手捐赠给了华侨慈善机构。

南养龙的一举一动博得了厄海军学院的喝彩，许多高级将领还成为他的好友。

一天，海军陆战队司令邀请他外出，在霓彩跳跃的红灯区，司令说：“南先生，您的武术才能我很敬佩。今天，我请你在这里度过一个轻松之夜。”南养龙站定了，他严肃地说：“司令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纪律是严格的，我作为其中的一员，只能为她添彩，不能为她抹黑。现在，请你马上送我回

去！”

一年的任教时间结束时，南养龙丰硕的成果留在了他乡：150名海军学员，200名华侨学员个个武艺精湛；个人和集体表演31场次，次次反响强烈。海军军徽、陆战队队徽、水兵荣誉锦旗……厄国的学员们纷纷把心爱的礼物送给他们尊敬的教练。

就要离开厄瓜多尔了，一位姓杨的华侨风尘仆仆来到机场，他急不可耐地对南养龙说：“南先生，请你不要回国了，我已为你备下了一栋别墅，我每月付给你3000美元，我为你办理一切定居手续，在这里开一个武术馆……”南养龙摇了摇头：“谢谢你的盛情，但我是中国军人，保卫自己的国家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自豪。”说完，南养龙迈着坚定的步伐踏上了回国的飞机。

故事七：埃及保卫官和秦新民握手时突然发力。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来到北京的时候，埃国同时派出了大批的保镖。下榻北京的第一天晚上，总统公寓的楼口只有随卫秦新民，埃方保卫官仔细地询问了情况，不放心地派遣了3名保镖。

第二天晚上，埃方保卫官又来找随卫秦新民。两个国家的保卫人员很亲切地攀谈起来。“我们是经过美国专门培训的，队员会驾驶汽车、飞机、轮船，你们会哪些保卫技能？”秦新民告诉他：“我们国家的保卫主要靠机智灵活的反应能力和勇敢顽强的作风，另外，我们会射击、武术、气功等警卫技能，部分队员也会各种驾驶技术。”

保卫官听了，频频点头，但他仍然留下了2名保镖。

第三天晚上，保卫官又来了。这一次，他有心想试一下秦新民的手力。在握手的那一瞬间，他钢钳似的大手猛地用力。可秦新民泰然自若，相反，自己的手力却蛇一样咬住保卫官的手，保卫官不由得“呀”地叫出声来。继而，又竖起了大拇指。这天晚上，埃及保镖酣然入睡。

穆巴拉克临行前告诉外交部的同志，通过几天的观察，中国的随卫训练有素，非常认真，非常可靠，他们感觉比国内还安全。随后送上埃及的牙雕工艺品，以表谢意。

故事八：法国女郎火辣辣的眼光凝视着张树桐。

有时候，小伙子的帅气也会引起许多麻烦事。队员张树桐在法国遇到的这件事就很让他伤脑筋。接上级指示，张树桐陪同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出访法、德等5国。

张树桐是个帅小伙，身材高大，目光如炬，走

在大街上，回头率不次于漂亮小姐，他因此荣膺“干部四大美男”之称。

荣副主席一到法国，各种社会活动应接不暇。随卫张树桐跟荣毅仁出进，自然也是人们注意的焦点。住到一家豪华的宾馆后，奇怪的事情便不断发生，明明刚刚送过了开水，又一个金发女郎推门而入；一个小时前打扫过的房间，漂亮的女服务员又来环视一圈。

这一天，张树桐刚从外面回来就发现有些不对劲儿，有位金发碧眼的小姐尾巴似地跟在他身后。到了下榻的楼层，小姐也尾随而来，张树桐索性站定了，看看她究竟要干什么。走近了，小姐火辣辣的眼光深情地凝视着张树桐：“亲爱的朋友，我可以请你跳舞吗？”张树桐摆摆手：“很遗憾，我在执行自己的任务，不能接受你的邀请。”金发女郎尴尬地站在那里，等到张树桐打开自己的房门，小姐飞快地跑来。可是，房门已经再次关闭。后来，陪同人员向小姐作了解释，多情的法国小姐将一块漂亮的手表和一些工艺品送给张树桐，要他作个纪念。

在国内，同样经受许多的考验。外军代表团来访，下榻的往往都是长城、王府、香格里拉、凯宾斯基等五星级宾馆。工作需要，李诚明也经常随卫外宾住进这里。

有一次，当李诚明随卫蒙古国军队代表团在王府饭店大厅活动时，一个穿着入时的女人来到他面前，轻声对他说：先生，晚上有时间吗？边问边将一张写有手机号码的纸条往他手里塞。见此情景，他严厉地说：“别给中国人丢脸，请你立即离开。”女郎见他一脸严肃，便知趣地走了。

故事九：王道喜身上6处受伤，鲜血染红了军衣。

把生死置之度外，保证首长的绝对安全，是随卫队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次，王道喜随一位军委首长参加会议。刚走到北京六铺炕，4个歹徒齐刷刷拦在马路上。王道喜上前劝说，让他们立即离开，4个歹徒见他势单力薄，根本没把王道喜放在眼里。一个人上来就给王道喜一拳，另外两个青年拿出匕首，挥舞着向前刺来。说时迟，那时快，王道喜一个扫腿将两人打倒。另一个大个歹徒抓起一辆自行车拦住车道，阻止车辆前行。首长从车里走出来，喝令歹徒停止行凶。4名歹徒一下子包围了首长，王道喜一边将拦道的自行车推开，一边把首长扶上车，让司机马上开走。

在搏斗中，王道喜的手枪突然被打落在地上，几个歹徒蜂拥而上。“千万不能让歹徒拿到！”王道喜什么都顾不上了，他迎着歹徒的匕首冲上去，尽

匕首刺入了王道喜的胳膊，但他已把手枪安全地踩在他的脚下。

在地方派出所的帮助下，10分钟后，4名歹徒全部被擒获。此时，王道喜已是6处受伤，鲜血染红了军衣。

事后，首长专门派人买来滋补品，看望王道喜。北京市公安局领导也来到首长驻地看望他，称赞他为首都人民除了大害。

“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分队长李诚明说，“因为我们肩头担负着历史的重任，不能有片刻的懈怠和麻痹，只能万无一失。说一样，我们和其他军人享受着同样的工资，同样的待遇，同样要站岗要训练，也要睡高低铺。”

但是，对于这支伟大的卫队，共和国没有忘记他们。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亲自签署命令，授予他们“卫国英雄干部队”的荣誉称号。

这是对他们过去的褒奖，也是对他们未来的期望。

十八、一个市局干部眼里的中南海

我们几人来北京开会，商量着去看望一下国务院办公厅的一位局长。这位局长是位大好人，他曾陪同一位退下来的老首长来我县参观。我们饱尽地主之谊，使老首长十分感动，这位局长对我们也十分信任，于是我们与他成了好朋友。

就这样，我们几个基层干部，有幸进入了中南海，有了一次难忘的中南海之行。

我们被带到一幢中西合璧的大楼里。那是一幢带有明显的50年代初设计风格的建筑，混凝土墙面加琉璃瓦大屋顶给人一种厚重的历史感。由于这种建筑多用于有权威的机关，因此在中国人眼中并未有穿西装戴瓜皮帽的感觉。中南海是一个大花园，绿树成荫，地面整洁得几乎一尘不染，树丛中有很多体态可人的鸟儿，甚至有丹顶鹤蓦然起飞。当鹤影掠过柳梢时，我们就看到透过桃花和柳丝的粼粼水波，那就是“海”。准确地说是湖。满族人叫湖为海，于是就这样从老祖宗那儿叫到了现在。

这位局长指着海对岸的水榭说：“这就是太液秋波，京华八景之一。”

“你们看，”这位局长往西边一指，“那是总理们的办公室。”我们向一片绿茵里望去，看到远处树丛后有几座整齐的小楼。据说副总理们形成了规矩，一变动职位就立刻搬出小楼，并不像我们地方上，卸了职常常还占着办公室长达数年。

我们进的那幢楼里驻着好几个显赫的单位。套用一个老概念，这里就是“总理衙门”。楼内的设

计和陈设显然已经落后，我的直觉是太像一家公社的卫生院。由于两边房都要考虑各自的采光，中间走廊就像一条黑胡同，除了两头各有两洞光明的出入门，隧道般的走廊里只有两个房间透出光，那就是挂着印有“男”“女”字样门帘的厕所。

这位局长的办公室一桌一椅一柜，十分简洁明快，很一般的写字台上堆着文件，我相信每一张纸片上都是国家大事。比起套房那一头秘书们的办公室，他的奢侈只在于多了4把咔叽布罩面的沙发。早听说中直机关很朴素，部长的写字台还有裂了寸把宽的口子的。今日一见，虽未有寸把宽口子，但比起我们乡镇长的富有时代感的办公室来就寒酸多了。庄先生委婉地说出了感觉：“局长的办公室整洁俭朴，看了让人很舒服。”这位局长说：“那是那是。这些摆设还是周总理在时定下的。”我们肃然起敬。

窗外一片鹅黄色的柳芽，隔着鹅黄有一片大屋顶，歇山边上画角雕梁煞是好看。我忙问：“这是什么房子？”局长说：“这是紫光阁呀。”

“这是紫光阁？”我真不信大名鼎鼎的紫光阁竟会在窗外的咫尺之遥处，它应该在极远处让我们从正面慢慢走近，慢慢瞻仰，慢慢膜拜的。然而生活的戏剧性就在于，当你还毫无心理准备的时候，伟大的紫光阁倏然间向你袒露了项背。

“好，先去吃饭，吃了饭我陪你们参观紫光阁。”局长不容分说，把我们赶向了饭堂。

由此，我们在这里“享受”了一次国务院的午宴。

局长决定尽地主之谊，要了一桌好菜。他兴致勃勃地打电话，把我们正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县长们也邀请来了。

午宴设在国务院的饭厅里。这是一个宽敞的饭厅，没有单间，没有雅座，清一色白塑料布桌面的16张大圆桌四四成行。我们进去的时候，已有许多工作人员在排队买菜打饭。一张桌边忽然站起来一个黑高个儿，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一看，是一位曾经碰到过的熟人，国务院研究室的一位博士。博士十分了得，据说每星期都被总理召去听听他的经济理论。这时候，他正十分谦逊地与我们握手，我们才敢大胆地往他碗盏里探看，究竟是什么营养在喂养这颗智慧的脑袋。这才发现不过一碟洋葱炒肉片，外加一碗米饭。局长一看我们如此熟悉，就热情地请博士共进午餐。局长冲着博士友好地笑着：“都在一幢大楼住着，也常常抬头不见低头见，可就是不相识。”我们忙把局长介绍给博士，博士立即认同，并说对局长已久闻其名，景仰不已。

我们的午宴被安排在东南角的那一桌。此举堪称民主，领导人请客添菜，还是在大食堂里，并

接受着广大“食众”的民主监督，这在当代中国恐怕也属难得。并不分宾主，随意而坐。国务院规定：机关招待来宾伙食以四菜一汤为标准。今天逐次上桌的四菜分别为萝卜片回锅肉、土豆烧肉丁、花菜炒肉片和炒猪肝。主人深怀歉意，说：“我们这里即使国务委员留客也这个标准。今天破例，加几碟凉菜。”局长斩钉截铁，使我们至今仍然相信这各一小碟的皮蛋、红肠、酸黄瓜和盐水花生米是局长自己掏的钱。饮料是印着“国宴专用”的北京啤酒，口味稍淡些，可随意开怀畅饮。

我们很有感触。其实机关留客，有此四菜也称实惠，何必七大盘八大盆的。主人说：“我对大家有个要求。菜一定要吃光，这里的炊事员对任何浪费都会提出批评。”我望着前面的那盆油花花的回锅肉，心里就开始盘算着如何吃光它。

话题自然问到总理们在哪里吃饭。主人说，总理中餐和其他副总理一样也在这里食堂吃。

我问：“他们也排队打饭买菜？”

“那当然。”主人说，“上次江西有同志来，看到国务委员们在饭堂排队十分感动，回去还写了一篇报道呢。”

“他们也用饭菜票现买现付？”

主人笑了：“副总理以上吃包饭，一月总算。”

“那万一好菜卖光，就喝汤？”

问题就在这里。总理们常常废寝忘食，所以也常常吃不上好菜。于是，现在给他们另外搞了一个小食堂，国务委员以上都到那里吃。”

“那他们吃什么标准？”我决定打破砂锅问到底。

“你有完没完？”庄先生打岔了。

“别插嘴，问题正关键呢。”我穷追不放。

局长乐了：“四菜一汤。具体地说，也就是今天请大家吃的。”

“哦！”原来我们的午宴是中南海最高规格了，吃到了总理们的菜谱。我们非常感动。

“来，请让一下。”大师傅端上了汤———盆蛋花汤，漂着绿油油的黄瓜片。

令我们高兴的是，国务院餐厅竟保持着 70 年代机关大食堂的传统，用脸盆盛汤菜。

吃罢午饭。他们便出来，来饱览中南海的风光。

“走咧！”局长一声令下，把我们带进了无限明媚的春光里。

中南海是中海和南海的总称，这条带状分布的湖泊应该包括北海。只是有着美丽白塔的北海已被辟为公园而置于红墙之外。

我们在长安街上常见的新华门是南海的大门。站在中海的桥边上望南海，只见彼岸一片浓郁，点点簇簇的多是二层以下的矮房，也看不出什

么奥妙。尽兴之余，便问起桥这边的矮墙里边是什么去处。局长说：“你这一问倒问对了，这里边是一个小游泳池，是毛主席用他的稿费造的。”我们都跑到门缝里去探看，也没见什么更新的东西。我们问，一般干部能不能来这里游泳？局长朗声回答：“能，院里干部职工的孩子们也都能来游。”

中南海里的建筑大多很矮小，且均是采用仿大屋顶的风格。这是为了与原先建在这里的古建筑相协调。当年建国时期中央竭力主张不要大兴土木，保持以植物造景为主体的自然风貌，这一传统至今保持着。这与隔湖相望的紫禁城的宫殿相比，不知朴实了多少。

中海里最令人兴奋的建筑就推紫光阁，原是乾隆皇帝建造的用来策问武状元的地方。局长说，这里曾摆过擂台。我看怕有困难，地方不大，而且多柱子，腿脚不好施展。

紫光阁建筑很像孔庙中的明经阁，双檐翘角，画栋雕梁，门前置一平台，有三道配有汉白玉栏杆的台阶可上去。台阶下是一片约有 300 平方米的小广场，县长说昨天他们就在这里受到李鹏总理的接见。我们在电视里看到李总理拿着一个手提式长线话筒在讲话。可是据县长说，当总理拿到话筒时，开口竟说了句意想不到的话。李鹏说：“哈，唱卡拉OK了。”总理的幽默，立刻活跃了接见的气氛。

紫光阁是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的地方。其实除了地毯和沙发外，整个大厅地地道道保留着原来的风格，像个大庙。进门是个屏风，屏风背面是宾主集体留影的地方。大厅的正中放着两把沙发，就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会谈双方主要人物的座位，两边又各有两排陪同人员的沙发。我们说，能不能让我们坐在这里照个相？管理这里的小姐一口应承说可以，还为我们搬来一盆鲜花以增添色彩。我们就有的坐主位，有的坐宾位，有的坐翻译位，模拟着电视里的伟大场面，兴高采烈地照了相。当我坐在首长曾坐过的位子上，抬头望着天花板上的雕栋画梁时，局长说，解放以来，历任总理都舍不得花大钱装潢一下紫光阁，还是前几年田纪云当副总理时下了决心，才重新整修了一下。我才意识到紫光阁确实金碧辉煌。

紫光阁两边各有小走道通到后面的武成殿。这样，阁与殿之间就围出了一块天井。走道是长廊式建筑，墙面上嵌满了石碑，都是乾隆为每一次出征的将士们写的谕旨，属于领导批示文件一类，多为“圣恩浩荡”之列，引起不起我们的兴趣。只是有好多漂亮的服务小姐都在用抹布一丝不苟地揩那碑上的灰尘，干得十分勤恳。

武成殿是领导们在接见前休息的地方，这地方不放记者们进来，所以罕为人知。我问服务员小

李：“你们平时怎么接待？”小李说：“也就是上上茶，时间长了，上一道毛巾。”我说：“这不跟我们地方上一样嘛，上不上水果？”她说：“一般不上。”“嘿，那还没我们气派呢！”

……

“你们一定得看看第四会议室，这里是国务院全体会议的开会地点，前几年谷牧还专门搞了一个大圆桌，气派极了。”

那一定得去看看。

第四会议室其实是个古庙。朱红的大门进去后是一个大天井，中间有一条石板甬道，两边是两排廊屋，正大殿就是会议室。我们征得保卫人员同意，进了花格子窗棂的殿门。我的印象里就像进了一间“堂前”，只是头顶上多了一个巨大的国徽。

我的天哪，局长推崇备至的大圆桌，就是我们在一般单位的新会议室随便都能见到的那种椭圆形会议桌。圆桌的两边各有三排长条桌，那是部长们的席位，而围着圆桌坐的是总理、副总理和国务委员们。我心里暗想，这种设备在我们县里也比比皆是。只是有一件东西倒真的是属于国务院的气派，那就是每个座位前都有一支如钢笔那样精细的麦克风。修修长长地伸展着，整个会议室恐怕有七八十只话筒。这里是商量国家大事的地方，要商量就得讲话，把高效的语音系统放在设备首位，这正体现了一种务实精神。

神庙似的第四会议室使人想到了中南海里对古旧设备的充分利用。听局长说，以前毛主席、周总理这些领袖们住的，也都是清朝留下的矮旧房子，只是旧城改造没有把中南海规划进去，不然，都属于拆迁之列。第四会议室有个小广场，绿荫白石，楚楚可人。一队警卫战士正在那里训练。整个场面就像是放无声电影，只有动作，没有军营应有的嘹亮的口号。战士们都一表人才，想必其中不乏“大内高手”。整齐而肃静的队列，使人更觉得这里不是非凡去处，虽然处处莺歌燕舞。

我们不知不觉来到一堵矮墙下。局长有些面露难色了：“这里面就是总理们的办公楼了，要进去，就得请示中央警卫局了。”

我们连忙谢绝。我们不过是进行了一次荣幸而奇异的旅游，有什么理由去干扰日理万机的总理们？

当我们离开这片土地重新站到北门口的时候，不禁再回眸深深地望了一眼。中南海，那朴素无华的中南海，那美丽动人的中南海。

十九、中南海里的女话务员

中南海电信局创建于 1949 年。这年元月 31

日，被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达一个半月之久的北平终于宣告和平解放。同年 2 月，军管会接管了北平电信局。

1949 年 3 月初，为准备中共中央从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迁来北平西郊香山，保证中央通信的需要，北平市军管会物资接管委员会电信接管部部王诤指示：务必于 3 月 23 日前建立香山专用局，后选定香山慈幼院理化馆旧址，作为香山专用局的局址。

装机工程于 3 月 10 日正式开工。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机、线话务员全力以赴，夜以继日奋战，装设自动交换机和无钮人工台；在香山、八大处、玉泉山和青龙桥一带架设中继线和临时专线，安装小交换，还扩充了部分郊区线路，并架通了到市内电话五局的中继线，全部工程于 3 月 23 日如期竣工开通。

遴选话务员工作是 2 月份进行的。一天，北平电信局年轻漂亮的长途话务员颜志明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去参加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北平市委举办的第一期干训班。她刚到教室，就有人通知她，叫她马上回去见军管会代表李玉奎同志。

她急急忙忙地来到李玉奎办公室。李玉奎严肃地对她说：“你是一名地下党员。党员要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要绝对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

李玉奎停顿了一下，继续说：“现在，党组织决定你暂停学习，调你去直接为党中央、毛主席服务。任务十分重要，也很紧急。要离开家庭，到新的地方去。”

颜志明听后，站起身说：“党叫我干啥我就干啥，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李玉奎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向她宣布三条纪律：一、不准和任何人联系，包括不准和父母通信。二、到岗后不许随意走动、外出。三、不许出任何差错，并严守秘密。

谈话第二天，颜志明和刘玉茹、祝静殊、张景兰等同志被送进香山大院，成了话务班的第一批话务员。

她们来到香山，便投入到建立香山专用局的工作中。

香山专用电话局建成后，周恩来前来视察，他对使用自动电话提出了意见，认为拨号电话不如人工电话方便，于是中央办公厅的叶子龙、汪东兴立即找到有关同志，要求马上想办法，限一天改完。有关同志立即带领机务人员进城，从原国民党联勤总部拉回一台磁石交换机和若干单机，线务员重新装机配线，只用了一天多时间，及时为中央领导装上了人工电话。

1949 年 4 月，为保证部分在西郊的中央军委和中央单位的电话通信需要，将围城期间被国民

党军队破坏的西郊 28 个局所进行修复，于 4 月 27 日开始装设共电复式人工交换机，至 5 月 19 日竣工开通。

随着中央逐步转入中南海工作和筹备第一次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加强保密和提高通信效率，北平电信局根据中央办公厅的决定，于 1949 年 6 月 26 日开始筹建中南海专用局。1949 年 7 月 15 日中南海电信局竣工开通。

中南海专用局开通后，香山局作为党中央通信服务的专用职责即告结束。而颜志明等同志也离开香山，随中央机关迁入中南海，成为中南海电信局的首批话务员。

作为中南海的话务员，她们感到无比幸福。当她们初次从交换台上听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历史巨人的声音时，她们竟然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泪水。

这些在北京长大的姑娘，能够走进红墙，直接为这些伟人们服务，的确感到无比的自豪和莫大的满足。但是，有一个难题也困扰着她们，有时在首长们浓重的地方口音面前一筹莫展。有一次，一位话务员接到毛主席的电话。这位话务员本来就有点紧张，再加上主席的湖南口音，听完后，这位话务员却不知所云。幸好主席察觉到了，又很慢地重复了一遍。原来，主席是要刘少奇同志听电话。

这件事，对话务员们触动很大，于是她们便开始苦苦揣摩各地的语言、方言，经过一番苦练，她们很快就适应了首长们的各地地方口音。

但她们并没有满足，而是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服务水平。由于她们苦心搜集，她们对首长与通信有关的一切细节都了如指掌。首长的秘书是谁，警卫是谁，常和谁联系，常去哪里，甚至连话机放置的位置，都清清楚楚。几十年来，她们把这些融入服务之中，做到了只要首长说个名字，就能马上接通电话。由于话务员对首长的习惯很熟悉，以至她们摇铃的长短轻重都有区别。话机离首长近些、摇铃就轻些、短些；话机离得远些，铃就摇得长些、重些；估计首长已经休息，就摇得轻些、长些。不同的习惯，摇铃也不同。周恩来总是要处理各种事务，所以，精神亢奋些，只需轻轻一摇，电话就接了；而毛主席往往沉于写作或思考之中，所以电话就摇得重些。强烈的责任心和热情的服务，使她们很快就获得了首长们的信赖。首长们开始把一些属于秘书职责范围内的工作放心地交给她们。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会议通知。时间久了，连很少开玩笑的少奇同志，也在电话里戏称她们为“电话秘书”了。

话务员们工作认真细致，她们能随机果断处置一些紧急情况。

有一次，周总理的专车正在向北京西郊某地疾驰，在行至动物园附近时，交通信号灯刚刚由红

灯转为绿灯后，仅一秒钟，又变成了红灯。总理的车刚要起步，又不得不停了下来。总理正在纳闷时，穿白色制服的交通警察走到总理的专车跟前，向已经下车的总理敬了一个礼，报告说：“接中南海电信局话务员转达的通知，刘少奇主席请总理立即回中南海参加一个紧急会议。”

周总理听后，马上叫司机掉头，驰回中南海。因为总理知道，既然信息出自中南海那些极负责的话务员之口，那就肯定不会有错。周总理曾不止一次地赞扬这些话务员说：“世界上哪一国的妇女也没有我们这些女同志本事大。只要告诉她要找的人，即使不知道对方的电话号码，她们也总能千方百计地给你找到。”

这次找周总理，话务员们也是费了一番心机。这天，周总理刚刚离开办公室，刘少奇就打来电话，请总理参加一个紧急会议。

周总理日理万机，从黎明到深夜，往往一天要去十多个地方，上午在大会堂开会，下午就可能深入某单位听取汇报，而晚上可能又到了外地去视察了。这些日程，又是属于机密。但是，只要有重大事情，中南海的话务员就能千方百计地把电话接到总理身边。

这天，话务员接到少奇主席的电话后，经多方询问，得知周总理乘车去西郊某地，至于最终目的，则谁也不知。话务员在对总理的出车时间，可能走的路线进行分析后，果断地把电话挂到了动物园附近的交通岗楼，请值班交警转告路过此地的周总理。就这样，她们圆满地完成了少奇主席交办的重要任务。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中南海的话务员换了一批又一批，但“说个名字就能通话”的传统一直没变，这给中央领导同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大家或许不知道，这样的超一流服务是在设备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做到的。当北京普遍用上自动电话时，她们还在人工接转电话；当北京大面积推广程控电话时，她们手上的设备还是其他地方开始淘汰的步进制、纵横制。现在设备已经更新了，但由话务员人工接转电话的方式依旧。因为，如果没有话务员这一环节，电话就可直接拨向任何一位领导人的办公室或床头，这样，我们的领导人就成天只能接电话了。

由于她们的精湛的业务素质，她们细致周到的工作态度，她们忘我的责任心、事业心，非常好地完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交办的重要事宜，时时刻刻地保证了通信畅通，为此，她们也获得了殊荣。从 1963 年起，她们就成了全国邮电系统的一面红旗。现在则是邮电部命名的“全国电信优质服务先进单位”。

二十、渡江英雄做客怀仁堂

在中国历史上，不可一世的秦王苻坚来到长江北岸，他望望身后浩浩荡荡的百万大军，又望望滔滔东去的江水，狂妄地大叫道：“我百万大军，投鞭便可断流，哼，区区长江，天堑何有？”

苻坚未能实现他的诺言，最后抱头北窜。

“投鞭断流，天堑何有？”真正实现这一誓言的，是军民团结如一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

百万大军，千里长江横渡，这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大壮举！这是滔滔不息的长江所经历的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

1949年初春，人民解放军百万之众，齐集江北。3月，渡江的准备工作就绪。这时，了解对岸的敌情工作就被提上了日程。当时，解放军没有侦察机，所以，派人渡江侦察便成为惟一可行的方式。

在渡江战役发起之前，解放军各部队共组织了10次渡江侦察活动。其中渡江侦察英雄的故事，最为有声有色。

当时，我军决定派一个营先渡江，是作为一个重大的战略任务来对待的。只要这个营顺利渡过江去，就可以用事实教育部队，证明长江可以渡过。只要有一个营插到敌后，就可以同江南游击队取得密切的联系和协作，在广阔的敌后展开游击活动，及时查明敌情变化，从敌人背后配合大军渡江作战。

经过充分的准备之后，在4月6日夜，分别由大队长亚冰和副大队长慕思荣率领，分两路从荻港附近登岸。

未等渡船靠岸，便被国民党军发现，于是偷渡变成强渡，经过激烈战斗，侦察营得以靠岸，然后，迅速向敌人后方插入。由于渡江部队人地生疏，一时同地方游击队未能取得联系，处境相当困难。后来，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找到了当地的游击队。他们之间密切协作，同追剿的敌人周旋，或白天在山林中隐蔽，夜晚活动；或化装成国民党兵迷惑敌人；或突然捕捉敌人的伪保长，强令其供给我军情报，促其戴罪立功。

有一次，侦察营化装进了一个村子，恰巧村里有国民党地方民团。问题麻烦了。但侦察英雄们控制了伪保长，装作是进剿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大耍了一阵威风，混过了敌人。后来，倒是当地的群众发生了怀疑：为什么这支“国军”对人民那么和气？那么讲道理？于是种种传奇式的神话般的传说就散布开了。

渡江侦察营确实取得了许多情报，为百万大

军顺利渡江立下了汗马功劳。渡江侦察营的许多真实经历，经过艺术加工以后，搬上了银幕。

在20世纪70年代，一部深受观众喜欢的《渡江侦察记》，就是选取了渡江侦察英雄的一个战斗侧面。影片不是虚构，而是确有其事。

在这部影片中，那个英姿飒爽，在敌占区高声叫卖“洋火香烟桂花糖”、侦察敌人情报的女英雄刘三姐，可谓家喻户晓。但关于这位刘三姐的原型的其人其事，人们却知之不多。

刘三姐真实的生活原型是马毛姐。

马毛姐，1949年参加渡江战役时年仅15岁。

在开国大典前夕，毛泽东得知在渡江战役中有一位年龄最小的女英雄，就亲笔写了请柬，邀请她来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可她家收到请柬后，父母担心她年龄太小，就没有让她去北京。

1951年9月20日，她又收到毛泽东主席发来的第二封请柬。这次她父母同意她去北京，她兴高采烈地打扮了一番，登上了北去的火车。

9月29日晚，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宴欢迎进京参加国庆庆典的各省代表团成员。宴会上，马毛姐被安徽代表团选为代表向毛主席敬酒，她激动地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10月3日，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与各地代表欢聚一堂观看京剧，马毛姐被安排在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中间，开戏前，周恩来指着毛姐，向毛主席说：“主席，她就是您两次邀请的渡江小英雄。”

毛主席听后，很高兴地拉着她的手，笑容满面地问她叫什么名字，毛姐结结巴巴地说：“我只知道我姓马，在家排行老三，别人都管我叫‘马毛姐’，我没有正式名字。”

毛主席听后笑了，侧过身对周总理和陈毅说：“这么伟大的小英雄，怎能没有名字呢？”在场的中央领导同志也都笑了起来。

第二天，一辆高级轿车将马毛姐接到中南海，车开到毛泽东主席的家中。

毛泽东见渡江小英雄来了，便将李敏、李讷叫过来，向她们介绍说：“这就是渡江战役中那个年龄最小的女英雄，你们可要好好地向她学习哟！和你们的年龄差不多，但她已是大名鼎鼎的英雄了。”

“对了，我们这位女英雄还没有名字呢。那就给你起个名字吧。你姓马，叫马毛姐吧。马是你的姓，名字第一个字跟我姓，好不好？”毛泽东问她。

她说：“好，我就叫马毛姐。”说完，向毛主席鞠了一个躬。

毛主席看到她穿得很旧，就派警卫员去给她买了几套新衣服，并特地用四菜一汤招待她。吃饭

时，毛主席不时地向她碗中加菜，并问她识不识字，想不想在北京读书。

毛姐告诉主席，她已在家乡的炳辉子弟学校上学，学了不少字，能看报纸了。毛泽东主席连声说道：“好！好！要努力学习，将来为国家建设做贡献。”说完，走到书架旁，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精致的笔记本，拉开扉页写下：

毛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月四日

几天之后，马毛姐要离开北京了，毛主席亲切地问她，愿意到哪里去玩？

毛姐说：“我想到上海去看看。”

毛主席爽快地答应了她，并专门安排身边的工作人员顾大姐陪毛姐等人坐飞机直达上海参观。

后来，马毛姐在炳辉子弟学校读了一年书后，又被送到安徽省工农干部学校培养。从工农干部学校毕业后，毛姐担任合肥麻纺厂团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并且先后被选为省政协委员、省妇联委员。

二十一、生活在中南海里的服务员

走进中南海，看到窗明几净的紫光阁和国务院其他会议室，看到总是那么整洁的沙发、地毯和办公用品，看到会议桌上那一杯杯冒着热气的清茶，就会自然地想到她们——国务院办公厅行政局服务处的女同志，她们是中南海里一支精干的“娘子军”。

她们承担着国务院领导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在国务院办公、接待外宾、召开会议等方面的服务工作。领导同志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也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会议很多，许多会议结束时已是灯火通明、星斗满天了。每次会议之前，服务处的女同志就开始了紧张有序的准备工作；会议一结束，她们立即清扫、整理会场，并做好茶具的清洗、消毒工作……由于人员少，工作多，工作质量要求高，在逢年过节任务集中时，不少同志每天都要工作十四个小时。

这是一支艰苦奋斗的“娘子军”。“艰苦奋斗，勤俭办事”是国务院机关的传统，也是国务院办公厅后勤服务工作的宗旨。国务院会议室、礼堂、首长办公室的化纤地毯、台布都已用了十几年没有更换，室内墙壁、门窗已十几年没有粉刷、油漆过，

在物质条件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的情况下，她们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来为国务院领导同志，为外宾，为来国务院参加会议的负责同志创造一个优雅、舒适的环境。使用过久的地毯毛掉了，不能用吸尘器清扫，她们就跪在地上，一块一块地清洗。在清洗窗帘、沙发套、地毯的过程中，有的同志手上磨出了血泡，有的手指甲被挤伤感染，她们一声不吭，依然坚持工作。仅1991年上半年，她们就自己动手清洗地毯800多平方米，沙发套、椅套、台布、窗帘4000多件，缝制新台布100多块……

这是一支年轻的娘子军，大都二三十岁，最小的才18岁。但她们深知自己的身份，自己平凡的工作联系着祖国的大业，自己的服务质量甚至表情冷暖、一举手一投足都代表着中南海，反映着国务院的作风。在五大洲客人面前自己还代表着中国。因此，她们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工作质量。

1997年5月23日《中华周末报》刊登了一篇《中南海姑娘的生活秘闻》，文章通过一位服务员的自述，使我们了解到了她们鲜为人知的生活情况。

文章这样写道：

她说：我从小特想当兵。高中毕业的时候，学校分了三个女兵的名额，凭着自身的条件，我一路过关斩将，很有希望。

这时却偏偏有人出来动摇我的决心。那天一上学，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指着一位中年男同志说：“这是中南海行政局的同志。”

我笑笑，没有明白老师是什么意思。中南海？不就是那高而又高、又红又长的围墙里面的“海”嘛。他来找我干什么呢？我有些拘束，手都不知道怎么放才好。

“想要安排你到中南海里工作，有什么意见吗？”

什么？事情来得突然，我有些反应不过来。

老师指着行政局的同志，说：“这位同志说，选上你，简直比选个局级干部还难。这不，全校才挑中你一个。你考虑考虑，回去问问爸爸妈妈的意见，要绝对自愿。”回家跟爸妈一说，他们表示没意见。

那年我才18岁，刚有选举权。我当然想走进那面墙，到毛主席、周总理当年工作过的地方去工作。

第一天上班回家，我就被家人围住，仿佛是欢迎贵宾。我连说带比画地告诉爸爸和妈妈，中南海的院子特别大，特别静。一进去，那感觉跟在外面就是不一样，觉得特别庄严。我被安排在服务处礼堂组，全组8女3男，负责国务院小礼堂和紫光阁的服务工作。

在红墙外面，人们往往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一言一行，吃、穿、住都想象得特神秘，一接触，其实也很普通，也很令人尊敬。有一天，我在组长的办公室里坐着，随手翻着桌上的一个本子，不由惊呆了！原来，我翻看的是一个账本。上面详细登记着中央领导人每次喝茶的欠款数。这个规矩，据说是周总理立下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到这里参加各种活动，喝茶都要付款。由服务员记账，一季度一清账，从工资里扣除。工资关系不在中南海的喝茶一律交现金。领导人到小礼堂看电影，也要收费；在机关食堂吃饭，也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排队。

时间一长，我们和中央领导人熟了，见面时也时常开个玩笑。

“小张，找对象没有？”

一位中央领导见到我们几个女孩子，常常这么问，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有一次，一个服务员给首长送茶水，不小心，托盘一斜，滚烫的一杯茶水全倒进了这位首长的脖子里，首长因烫伤住了院。那个惹祸的服务员难受得直哭。那位首长反过来倒安慰起服务员来，说没有什么关系。

对于一般的工薪阶层来说，每日工作是以8小时计算的，而我们基本没有工作时间的限制，我们的工作时间是随着首长的工作时间转。首长们上午8点钟开会，我们早晨六七点就得上班，提前搞好卫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如果下午还有会，中午就不能休息，连轴转；如果赶上首长们一连开几天会，我们每天7点钟上班，晚上12点下班，等到会议一结束，即便有山珍海味，大家也全没一点儿胃口，只想好好睡一觉。

有一位男服务员找了个女朋友，他首先声明：

我的工作没个钟点，不知道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下班，所以，如果约会，不能保证按时赴约，甚至不能赴约，到时候还请小姐谅解。女方看上了小伙子的诚实、潇洒，小嘴一撇，说：“没关系。”心里却绝对不信。结果呢？他们谈了3个月，几乎天天约会，但实际上只见了两次面。最后一次小伙子还迟到了半个小时，直气得那位女同胞说什么也不谈了。

服务员的工作，听起来简单，实际上也不是那么容易干的。你别看我们平时收拾得个个像“小姐”、“绅士”，干起活来，脏得有时候跟炸油饼的差不多。比如清扫厕所，有的就要用手去抠便池里的污垢。

削铅笔的活儿该好干了吧？削个三支两支当然不在话下，如果一多，也够受的。小礼堂常常要开会，上百人的会议，每个与会者要备好3支铅笔。每个服务员平均要削一两百支铅笔，一根接一根地削，削完了，指头都会被削笔刀磨出个大泡。

偌大的礼堂，辉煌的紫光阁，到处是地毯、沙发。玻璃要擦，地毯要除尘，厕所要清洗，沙发套要换，还有杯子要洗，要消毒；紫光阁还常常设便宴，所有的沙发、摆设要撤换成宴会式的，活儿忙不完。但是我们干起工作都特“投入”，任何地方，都是绝对的干净，哪次服务都是绝对的高质量。

什么，我们工作这么辛苦，又守着中央首长，钱准少不了？那你可就说错了，我们的工资比起一般单位来低得多，除去基本工资，没有什么别的进项。时下年轻人时髦的名牌，跟我们“绝缘”。

责任编辑 黄 强